

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101 期

教 育 文 选

Selected Works of Education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学校管理专辑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教育文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德育、学校管理专辑

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101 期

2023 年 7 月出版

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主编：朱代武
副主编：徐敏 丁晓宇
审校：刘洪全
编辑：曾红燕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南昌路
邮编：618307
电话：0838-5182660
传真：0838-5183805
E-mail：
tsgxjb22@yahoo.com.cn

目 录

| | |
|------------------------------------------|----|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多维透视····· | 1 |
| 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价值与实践····· | 9 |
| 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四重逻辑····· | 13 |
|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探析····· | 18 |
| 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 | 24 |
| 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提升探析····· | 29 |
| 高校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困境及改进策略····· | 32 |
| 高校应急管理的困境、趋势与完善····· | 36 |
| 整体性治理：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理念与策略····· | 43 |
|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育人研究····· | 52 |
| “知乎治校”现象分析 及其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启示····· | 56 |
| 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构建： 生成逻辑、功能界定与维度设计····· | 62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多维透视

文 / 王刚 贾雯

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育教学重中之重的任务。高校思政课如何及时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课堂教学，如何及时、准确地向广大青年学生系统讲授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对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意义重大。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切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及课堂教学环节，同时开展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阐释。一方面，党的二十大精神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必须借助高校思政课这一主渠道，才能有效传递给广大青年学生，落实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学生的要求；另一方面，高校思政课的课程属性、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目标等都决定了必须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教育教学全过程，才能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实现高校思政课的使命和任务。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体现课程本质属性

不同事物间相互区别的标准在于其本质属性的差异。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不仅具备一般课程的教育功能，还承担着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重要职能，这使它融教育属性、文化属性、思想属性、政治属性于一体。因此，思政课必须第一时间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关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始终保持教学内容与党的指导思想和创新理论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只有这样，思政课才能保持高度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不断锤炼讲好马克思主义道理的过硬本领，通过讲好道理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彰显课程本质属性。

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因此，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是课程属性的本质要求，是保证课程要求不走样、课程教学不偏航的根本保障。党的二十大取得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思政课必须精准把握和深刻阐释的核心内容；党的二十大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实践意义和政治意义是思政课必须向青年学生传递的关键内容。只有这样，高校思政课才能真正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要求课程教学内容不断更新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实践土壤孕育下产生，并伴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这就决定了思政课必须时刻保持以战略性的眼光关注时代发展，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及时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并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设计，通过课程教学讲清楚、讲明白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党的初心使命，不断夯实青年学生的思想之基、理论之基。

高校思政课是包含多门课程和各学科知识的集合，教学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动态变化性高度统一的特征，这必然要求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融入教学内容。党的二十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进到新的历史方位，在取得伟大变革基础上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勇前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举世瞩目的大会。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决策部署是具体明确的，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全面系统的，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党的二十大精神，一方面是高校思政课必须讲授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与各门思政课的教学内容高度契合，并从逻辑上将基本原理、客观实践与历史规律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线索，从而帮助青年学生从宏观和整体角度更好地掌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

（三）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契合课程价值目标

高校思政课不仅承担着理论教学的任务，更要对青年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塑造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因此，高校思政课“无论怎么讲，最终都要落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上来”。思政课教师要通过教育引导，使青年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自觉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形成正确的价值认知和行为规范，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十九大以来五年的工作以及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特别指出，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十年历史性成就的取得究其根本在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还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提出党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路径，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宏伟蓝图。因此，必须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帮助青年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了解国家发展的伟大变革，进而使广大青年学生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增强肩负使命的决心和信心，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二、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基本遵循

高校思政课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务必遵循课程教学基本规律，必须紧扣教育教学目标，在此基础上厘清融入的内容，构建起由点带面的立体融入模式，并全方位、有侧重地建立起融入长效机制，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一）坚持“三个全面”

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了具体要求，即要以“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推进学习的全进程。“三个全面”的要求同样适用于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

的过程中,思政课要正确运用“三个全面”的学习方法,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三进”工作能够扎实有效地推进。一是必须坚持“全面学习”。“全面学习”是顺利实现融入的前提和基础,其具体要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必须原原本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对报告的体例、内容和关键性问题有系统完整的掌握,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其次,必须立足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长时间轴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同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届历次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融会贯通,达到学习内容的全面性和体系化。再次,必须对各门思政课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等有全面系统的把握。二是必须坚持“全面把握”。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深入把握大会报告的关键核心,深刻领会大会精神的本质内涵,这既是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的更高层次目标,也是大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一步。融入过程中必须遵循科学的认知规律,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抓住全面中的重点,抓好整体中的局部,进而在把握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深入拓展,构建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的学习模式,全面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三是必须坚持“全面落实”。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都是虚假和空洞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只有得到贯彻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因此,高校思政课对于党的二十大精神不能仅停留在学习层面,还必须制定切实有效的方案,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课程教研工作的高度融合,达到学以致用目标。在全面落实的过程中,思政课要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作用,通过实景化知识场域帮助青年学生真实感受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在知行合一中激发他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情,不断厚植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

（二）坚持“五个牢牢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明确指出,要以“五个牢牢把握”为科学指引,深入学习并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五个牢牢把握”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及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等方面,明确提出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总体要求,这为我们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过程中,必须对每一个“牢牢把握”的提出背景、具体内容和实现目标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学深悟透其中的深刻内涵。同时,在融入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五个牢牢把握”的逻辑关系,通过对“五个牢牢把握”的系统梳理,向青年学生讲清楚党的二十大精神解决了“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三大问题,讲清楚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讲清楚只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坚持“九个深刻领会”

《决定》就如何学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必须以“九个深刻领会”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九个深刻领会”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回答了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该高度关注哪些问题,并且就必须坚持哪些基本原则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九个深刻领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九个

板块充分立足发展之变、发展之需，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题主线、目标任务以及重大部署，具体分析今后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新调整、新规划，深刻阐明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根本遵循。

因此，思政课教师必须立足“九个深刻领会”的学习要求，完整准确把握每一个“深刻领会”的核心要义，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九大板块内容的系统把握，从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九个深刻领会”为指导，通过精心设计，做好“九个深刻领会”的核心内容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通过课程教学让青年学生全方位地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遵循、战略安排和目标任务，增强学生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信心和坚定决心，实现思政课凝心铸魂的课程使命。

三、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的教学建议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是全面的。高校思政课（本科）作为六门独立课程的集合，各门课程之间既有传授知识、提升素质、塑造灵魂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每一门具体的思政课在教学内容、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必须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遵循各门课程自身的教学要求和规律，拟定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的总体教学建议，在找准着力点的基础上科学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一）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要聚焦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养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在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和法治观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除了要重点抓好“五个牢牢把握”、“三个全面”以及“九个深刻领会”，还必须在明确课程定位的基础上，结合课程特点和教学重点，有针对性地对融入内容进行选择。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中，要做好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要把文字内容上升到情感的共鸣和价值体系的培养层面，避免出现生搬硬套、空洞灌输的问题。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应结合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展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昂扬姿态阔步向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从而引导大学生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课程内容应结合新时代前后中国的发展变化，结合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程，帮助学生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激励青年学生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责任意识，从而实现以融立德、以融增信、以融促行的目标。

此外，“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还要充分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部分的核心要义。一方面通过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讲解，帮助大学生充分认识法治在党和国家事业稳步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坚定青年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自信，另一方面，在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过程中，必须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相结合，通过教学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体系和深刻内涵，不断提升青年学生的法治素养。

（二）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把握历史线索和历史规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紧扣课程特色，以宽阔的历史视野统筹新时代前、进入新时代

以及未来中国发展几个历史阶段，以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和规律，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引导学生以史为鉴、赓续传统、面向未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从宏观视角进一步凸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讲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近代以来由梦想变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全面推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要以大历史观正确分析“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坐标轴上把握“三大规律”。在此基础上，讲清楚新时代十年取得的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所在，从而帮助学生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和主线，进而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正确判断。

除了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实践发展的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还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讲清楚从“马克思主义行”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历史逻辑。中国近现代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才能焕发生机活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总结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每一次扎根文脉、立足国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过程都对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指导青年大学生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所在。

（三）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要坚持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鲜明特点集中体现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领导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政治宣言。这就决定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高度统一性，因此必须深入挖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原理性要素，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度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其他课程在教学中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提供理论支撑。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应该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相结合，讲清楚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不动摇，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认知体系。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始终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其思想内涵与价值指向才能被中国人民接受，成为领导中国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

在具体融入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要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讲清楚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贯原则，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立足各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开放发展的科学理论，必然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发展。要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在伟大历史变革、党的使命任务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中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人民观、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通过中国发展实践中大量的例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融入过程中要立足“六个坚持”，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讲清楚这六个方面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具有深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讲授“六个坚持”，帮助学生全面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魅力与实践价值，并深入理解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要以史为据、以理服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一门兼具历史性和理论性的思政课，这就要求该课程在思考如何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教学内容中既要做到全面系统，又要避免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出现重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要在教学中讲清楚“两个行”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明白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并遵循中国特点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且在对这一部分进行教学设计时，应该结合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飞跃相结合，实现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融会贯通。

融入过程中还应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题的梳理，通过纵向对比的方法，帮助大学生强化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的认知，并在对比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现“四个伟大飞跃”的实践进程的正确认知，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更好地领悟革命主题、建设主题、改革主题和复兴主题的深刻内涵，进而更加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钥匙，从而增强“四个自信”。

（五）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要做好局部与整体的高度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内容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整个报告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因此在融入该课程的过程中必须体现出与其他思政课不同的特点。授课教师必须做好整体融入、全盘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必须系统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到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部融入教学内容，同时做到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届历次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体系化教学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理论认知体系。

此外，教学内容设计上还要做好重点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的过程一定是有侧重、分层次的过程。思政课教师应把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要点作为教学重点，讲清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具有标志性、原创性的重大成果，重点突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件大事”、“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里程碑意

义”、“三个务必”、“第二个答案”、“归根到底是两个‘行’”、“中国式现代化”、“六个必须坚持”、“五条必由之路”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同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点带面、全面融合的建设思路，帮助学生通过学习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不能仅仅停留在内容的融入和内涵的把握层面，要通过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教学，更好地帮助学生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更加清晰地认识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中，“两个确立”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最强大的定海神针和最关键的领导力量。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内容的重中之重，必须讲清楚、讲透彻。

需要说明的是，“形势与政策”课不是融入的问题，而是要重点讲授的问题，该课程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教学专题，给学生系统讲授。

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不仅涉及必然要求、重要价值和内容体系等一系列问题，还应积极思考如何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效融入思政课，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课必须积极探索，构建有效推动融入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责任意识，推动形成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的强大合力

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社会环境、校园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条件会对课程教学效果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这就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高校提高政治站位，充分重视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这项重要工作，积极为思政课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以及必要的条件，构建起协同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融入，更是形成思政工作大格局的过程。对于高校而言，各类课程要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思想政治工作要贯穿高校各门课程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高校必须统筹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中的作用，把党的二十大精神教育贯穿学生在校期间全部学习生活，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

各高校应加强“大思政”协同机制建设，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由课堂内引入整个校园文化活动中，走出校园走向社会。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应积极加强与校内宣传部门、学工部门的沟通合作，形成高校思政课与校园各功能板块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上的协同机制，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同时，马克思主义学院还应加强校际交流合作，打造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为核心、以思政课建设为抓手的平台，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三进”目标的真正实现。

（二）加强集体备课，群策群力保障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有效融入

思政课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实施者”，是思政课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是思政课建设的主导性因素，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精神能否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关键在思政课教师的主观意识和教学能力。思政课教师必须具有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在行动上。

“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意义深远，广大思政课教师必须率先学、学深刻，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为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课程打下扎实的基础。首先，应该通过集体备课的形式促使广大思政课教师成为领学者，原原本本学原文、读原著，以通读和精读相结合，吃透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内容，同时用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权威辅导材料。其次，要通过集体备课形式使思政课教师成为好学者，形成学习的长效机制，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动集体学习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促使思政课教师积极主动参与集体备课，立足自己的专业领域开展备课研讨，在思想火花的交流碰撞中更好地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再次，要通过集体备课培养思政课教师成为会学者，学深的目的是悟透，即通过集体备课，帮助思政课教师形成科学且深刻的认知，进而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和要义通过教师个性化的教学传授给学生。

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积极拓宽思路开展集体备课。一方面，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跨地域马克思主义学院间的备课活动，通过校际交流帮助思政课教师拓展学习渠道，共享教学资源，不断提升教师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广大教师以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另一方面，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应积极邀请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专家学者参与本学院的集体备课活动，借助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思政课教师更好地把握宣传阐释的重点内容。

（三）加强学术研究，促进理论研究向教学实践的积极转化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必须讲好教学内容中的原理，讲清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哲理。因此，广大思政课教师不仅要在培养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水平上下功夫，还必须高度重视科研工作，推动教学和科研融为一体。教师要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丰富教学的知识体系，以科研成果提升教学内容的学理性，以学术思维支撑教学思维，实现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高度统一，真正实现思政课讲道理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的过程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教学融入，融入着力点的选择和融合体系的建构全部建立在学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只有具备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高的学术研究能力，才能全面把握、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理论创新点，才能更好地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才能深刻揭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因此，夯实科研基础、加强学术研究是学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本前提。

此外，对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需要进行学术阐述和学术研究，必须调动广大专家学者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研究，通过研究成果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优势，在广泛研究的积淀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也必须充分调动广大思政课教师的科研积极性，鼓励教师以科研回应问题，用学术关切热点，为提高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智力支持。

（四）丰富教学载体，提升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效果

高校思政课作为偏重理论阐释和价值观培养的课程，更加需要合适的教育载体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搭建起顺利传递知识与情感的桥梁，通过丰富的载体拉近教与学之间的距离，建

构促进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学习平台，不断提升青年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的过程中，各高校应统筹规划、精心安排，采用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阐释。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在拓展校外实践基地、丰富教学载体上下功夫，应结合学校和地方实际，充分利用校史馆、红色文化纪念场馆、乡村振兴示范点等优质资源，积极开辟传统课堂模式外不同主题的第二课堂，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与适切的教学载体相结合，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学习。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手段被广泛运用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思政课必须高度重视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模式的优化，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升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实效性。要主动契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信息接受方式，通过网络平台辅助课堂教学，借助多元化、生动化的网络作品引发青年学生的情感共鸣，帮助学生在情感认同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素养和道德认识水平的提升。

总之，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是一项需要长期建设的系统工程，要做好一系列的重要工作。首先，融入过程必须坚持全面性，要在系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部内容的基础上思考融入什么以及如何有效融入。其次，融入过程必须保证正确性，思政课具有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教师在进行理论阐释的过程中必须做到有理有据、准确到位。再次，融入过程必须坚持创新性，高校思政课应加大改革力度，积极打造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搭建全方位、多领域的教学空间，促进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中得以全面推进。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1期）

伟大建党精神 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价值与实践

文 / 梅丽 倪培强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贯穿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党的百年建设历程中，无数青年以“敢于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品格，

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光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无序扩张和思想渗透，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遭到冲击，在思想上出现理想信念缺失、奋斗意识弱化、缺少集体精神、利己主义和享乐思想严重、责任意识淡漠等问题。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宝库，也是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精神力量，对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培育大学生的担当意识、端正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筑牢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增进大学生的人民情怀和提升大学生的精神风貌等具有重大意义。高校肩负着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任务，担负着传承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发展的责任。因此，高校要以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大学生，并不断探索有效的路径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的育人效果。

一、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智慧力量，是中国精神的最高层次，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追求真理和理想、立志践行初心和使命，勇于担当、为民谋利，艰苦卓绝、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伟大建党精神对塑造新时代大学生“精神家园”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

1. 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的精神坐标。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辉煌历史就是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国家兴盛和人民幸福为宗旨，不懈努力、奋发向上的奋斗史。在这一进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伟大建党精神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伟大力量，标注了大学生树立理想信念的精神坐标。在思想多元化、信息碎片化、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信息化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难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的错误价值倾向，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想不断渗透也阻碍着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势在必行。伟大建党精神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无私奉献、努力奋斗、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学习伟大建党精神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为大学生指明了奋斗方向，提升其为国奋斗的信心和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的恒心，促使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提高个人能力、展现个人价值、实现自身理想。用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大学生，既是实现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2. 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大学生担当使命的精神动力。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凝结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党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然而，当前部分大学生存在社会担当、家庭担当、自我担当意识不足，缺乏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能力及动力，开展大学生担当意识的培育刻不容缓。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敢于担当，不怕困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攻克重重难关，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这一进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夺取新胜利的重要支撑，也为大学生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奋斗动

力。学习伟大建党精神有利于新时代大学生形成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树立责任担当意识,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3. 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大学生英勇斗争的精神支柱。百年来,我们党在应对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的斗争中,铸就了不惧强敌、不怕风险、敢于斗争、勇于拼搏的精神气质。“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是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做出的庄重承诺,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精神魂魄。然而,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新时代,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状态,外部的和内部的、进步的和倒退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先进的和迂腐的思想并存,为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带来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一些错误思想和价值观念侵扰着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报效祖国的斗志。伟大建党精神为大学生提供了向上奋进的强大精神支持,增进大学生建功立业的志气、骨气、底气,是支撑大学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支柱。迈入新时代,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大学生一代的茁壮成长需要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大学生只有将伟大建党精神铭刻于心、落实于行,继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精神,矢志不渝地为党和国家建设事业而奋斗,才能鼓起创造美好新时代的精气神,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

4. 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大学生不负人民的精神源泉。不负人民即中国共产党坚定人民立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自始至终都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百年党史也充分证实,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彰显着“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激励新时代大学生“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源泉。然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西方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渗透到我国的思想意识领域,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受到深远影响,如西方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导致部分大学生缺少集体主义观念,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而在新时代新征程,大学生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后续接力者,不仅要有过硬的本领,更要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良好政治品格,这一政治品格直接关乎党、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中发掘培育大学生“为民情怀”的情感素材,帮助青年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价值追求,使新时代大学生自觉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绽放青春光彩。

二、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大力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就必须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基于伟大建党精神的育人价值,紧跟时代要求探究以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有效路径。

1. 以课堂为引领,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温度和指向性,同时“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第一,要用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这个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深入挖掘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层次内涵,以建党理论为主导、以建党时间为主轴、以建党问题为主题、以党的建设活动中历史人物为主体、以建党事件为主线,引导大学生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伟大建党精神,厚植大学生爱党爱国爱民的情感。第二,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发力,科学全面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伟大建党精神潜移默化地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产生春风化雨润人心的教育效果。第三,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担负着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使命。一方面,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教育与培训,加强对教师的伟大建党精神培育,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使其能更好地承担起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的重任。另一方面,教师自身要有宽广的胸怀,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拥有广博的学识,自觉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伟大建党精神,以通透的学理解答学生的困惑,以真理的伟力引导学生,以科学的理论说服学生。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使学生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并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更加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

2. 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充分发挥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作用。发挥伟大建党精神对大学生的引领作用,开展内容新颖、形式活泼、乐观向上、品质上乘的校园文化活动。一是要重视开发校歌、校训、校史等具有建党精神元素的校园文化,以图书馆、校史馆、档案馆等为载体,重视将校史和伟大建党精神相融合,充分运用红色文化、先进文化塑造学生灵魂。二是营造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核心的校园物质文化氛围。学校可以通过校园展板橱窗、墙报板报等宣传平台,建设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班级文化、宿舍文化和食堂文化等,营造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旨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润物细无声的校园文化中体悟“伟大建党精神”,并自觉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品质。三是加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的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以文化活动为承载,以党团组织为阵地,充分利用七一建党节、国庆节、五四青年节等重要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伟大建党精神主题活动。例如,定期邀请革命英烈后人、红色文艺家等到学校做专题讲座或举办文艺演出,鼓励全校师生打造能够体现伟大建党精神的各种歌剧、舞剧、话剧、音乐绘画作品,大力开展“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勇担民族复兴重任”的主题教育活动。不断创新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塑造和现实转化形式,在校园内营造学习党史、探究党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氛围,使伟大建党精神成为大学生的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

3. 以网络为抓手,充分释放伟大建党精神的正能量。高校应拓展伟大建党精神学习的网络平台,增强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效果。一是要打造伟大建党精神学习教育平台。学校应积极创建伟大建党精神学习教育网站,整合优质的建党精神教育资源,将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平台打造为内容详实、搜索便捷、互动性强、图文并茂、声色俱全的文化资源平台,并借助优质教育平台开展师生喜闻乐见的伟大建党精神网络教育活动,推进线上线下伟大建党精神教育相结合,形成强大教育合力。二是运用互联网传播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大学生是互联网上的活跃群体,学校要牢牢把握在网络中传播伟大建党精神的话语权,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的网络教育内容供给质量。与此同时,学校还应完善相关制度,对网络教育内容进行实时监管,加强对大学生党史知识的教育,提升伟大建党精神的影响力,增强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三是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校可以打造伟大建党精神主题微信

公众号，营造浓厚的线上、线下学习氛围；依托网络慕课平台推出伟大建党精神教育专题讲座，邀请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专家、革命英雄后人、优秀共产党员等为大学生做网络专题讲座。学校可以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与党的建设相关的人物故事等，使大学生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4. 以社会实践为依托，深入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学校需要多方面着手、多点发力统筹推进各项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成效。一是要开展校内实践活动，拓展伟大建党精神学习的第二课堂，使大学生在伟大建党精神学习教育活动中领悟党的伟大精神。学校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团日学习会议、专题研讨会议、实践交流会议等学习活动，切实提高大学生建党精神学习效果。在实践中，大学生党员应充分发挥先进模范带头作用，力争走在建党精神学习的前头，在学懂弄通做实上当好排头兵，做到主动自发学、即时跟进学、结合实际学、原原本本学，增强伟大建党精神学习教育的实效。二是在红色实景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大学生到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革命遗址等红色场地，开展实地参观、现场教学等活动，让大学生在现场体悟革命之艰难、建党之艰辛，引导大学生将有形的红色遗产与无形的红色精神相衔接，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实际生活中，更加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以伟大建党精神激励自身不断奋勇向前。

（摘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6期）

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四重逻辑

文 / 陈琪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明确了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任务和使命。从历史、理论、价值和实践四个维度出发，厘清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生成理路，对于全面把握立德树人的核心要义，指导和推动高校精准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历史逻辑

立德树人一词并非生成于新时代，而是传统语汇下对当前教育工作根本任务的时代表达。揆诸中国立德树人的历史，探寻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对立德树人的全面把握意义重大。

（一）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立德树人思想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根溯源。“立德”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其明确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句话把立德位于三不朽之首，体现了古人对于德的重视程度。“树人”一词最早见于《管子·权修》，管仲明确提出了“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周朝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将立德树人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孔子的“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曾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均体现出古人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国家命运、社会发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深入理解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提供了理论沃土。

（二）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生成于马克思人学思想

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所提出的“人的本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对教育等观念的认识给予立德树人理论指导。马克思在1844年4月至6月未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通过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展现了对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向往。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唯心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论证了实践以及环境对人的重要性，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们开始从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思考人的培养问题。

（三）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成熟于中国共产党育人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人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发审时度势，为立德树人思想的确立和深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中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育人方针”；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4月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江泽民同志作出了“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指示；胡锦涛同志强调高校教育应坚持“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立德树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以及“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二、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明确高校立德树人的内涵及其理论内部的逻辑关系，是实现其向现实性转化的基本前提。只有对其定位、内涵、核心进行全方位细致的诠释，才能保障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系统性开展。

（一）定位：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新时代高校的使命和本质在于立德树人。高校是面向大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场所，在实现“立德树人”过程中为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而其所立之德在于能够肩负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之“大德”，能够促进社会文明风尚之“公德”，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之“私德”；所树之人在于能够成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努力的奋进者，能够拥有真才实学而又勇担大任的建设者。通过立德树人使大学生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帮助他们坚定政治方向，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代新人。

（二）内涵：新时代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德树人应该与新时代的时代特征相符合，赋予“德”以更为深刻的内容。“德”是指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道德，内容包含了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网络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表现在价值观上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则是指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实现中国梦的追梦人。立德重在修身养性，道德乃为人之根本，树人旨在培养真才实学之人。

（三）核心：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核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核心是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德，树有理想信念、有实干本领、有责任担当之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在价值层面的体现，具体由24个字组成，体现出不同层面的道德要求。新时代高校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立德树人工作，做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培育勇担社会重任、具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高校大学生，引导他们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

三、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价值逻辑

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着眼于打破传统育人工作中的思维定式，化解部分高校存在的“立德”与“树人”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表现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教育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于时代新人应具备哪些优秀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新人要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应当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具有善良的道德情感、正确的道德判断、自觉的道德实践。在新时代，只有坚持立德树人，才能培养出品德优秀、政治过硬、知识丰富、多元发展的时代新人，高校立德树人是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保证。

（二）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的重要途径

人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发展允许的条件下，教育只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途径之一，但却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较之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剥削压迫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加之我国重视教育，强调立德树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正在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总目标靠近。

（三）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学宗旨的体现

201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强调把立德树人贯穿于高校教育全过程。高等教育相对于中小学教育与成人教育而言，其主要针对处于成长阶段

的大学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建校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和崇高理想信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合格人才。高校立德树人旨在培养大学生高尚的人格，促进大学生德才兼备，体现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宗旨。

四、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实践逻辑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推动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有效落实是高校工作最终落脚点，必须加固防线、坚守阵地、消除盲区、挖掘资源，让立德树人在高校真正落地生根。

（一）加固防线，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 加强党的领导，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

高校应始终重视立德树人，将其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首先，高校党委始终坚持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确保高校正确的办学方向。高校党委重视立德树人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保证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重视立德与树人相结合。高校在发展过程中，既要统一标准，也要各有侧重，在统筹协调中真正实现立德与树人的有机统一；最后，制定立德树人工作评估体系，鉴定立德树人工作的成效。

2. 贯彻“三全育人”理念

高校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首先要坚持全过程育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别强调，把立德树人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其次要坚持全方位育人。高校应以六门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导，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学生党团组织的作用，以党的“三会一课”、“团课”为阵地，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的教育因素，建设课程思政，实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最后要坚持全员育人。构建党委领导下，以各院系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专业教师为主导，形成各级职能处室、团学、工会、后勤、人事等组织齐抓共管的“全员育人”模式，实现“育人主体”的广泛性。

（二）坚守阵地，提高高校立德树人实效性

1. 增强高校立德树人师资力量

高校教师队伍是落实立德树人的主要力量。首先要配齐高校立德树人的师资队伍。高校立德树人师资力量完备与否，直接影响到高校立德树人的实效；其次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应着重提高现有教师队伍业务能力，改善教师队伍结构，打造一批政治坚定、品德高尚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其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主导作用；最后要拓宽用人机制。制定灵活的选人用人制度，遴选一批道德模范充实到高校教师队伍，发挥其榜样育人的良好作用。

2. 重视高校立德树人课堂建设

首先要坚守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育是百年大计，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课堂，引导大学生树远志、担重任；其次要深化教育改革，实现高校立德树人内容的与时俱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旋律确定，树人的内容应紧跟时代发展，做到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内容，注入新的理论活力；最后要创新高校立德树人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各高校应主动引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积极搭建一个网络化的教学数

据大平台,实现课堂教学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育人平台。

(三) 消除盲区,全方位打造立德树人环境

1. 营造立德树人的良好校园环境

高校应当充分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发挥好大学生社团和各班级的组织作用;高校党委学生工作处应精心组织、引导策划,在了解大学生品德和才能现状的情况下,开展针对性的校园活动;同时,高校各教育主体应将大学生德才教育巧妙地融入高校精神、学风校风之中,全方位营造立德树人的良好校园环境。此外,积极推动建设协同育人机制和制度体系,强化高校各部门的联合,发现育人问题及时沟通解决,为大学生德才兼备与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制度基础。

2. 打造立德树人的良好校外环境

高校应主动探索校内育人与校外育人的联动体系,在良好校园环境基础上营造优良的校外环境。首先要打造立德树人校外实践基地。例如,创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以实物、实景、实例等为载体,通过充分挖掘红色资源的教育作用,搭建立德树人大课堂;其次要统筹校外各种育人资源,不断净化校外环境,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外氛围,实现高校立德树人;再次要开展弘扬时代新风活动,做到“三结合”,即结合高校、大学生、社会发展实际,创新开展多元主题,搭建立德树人的活动载体。

(四) 挖掘资源,提高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1. 提高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大学生是高校立德树人的主要对象,其自我教育能力直接影响到高校立德树人的成效。首先要引导大学生主动学习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使其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做到明知大德、公德和私德,实现社会主义道德内化于心;其次要引导大学生积极进行道德践履,通过实践活动锻炼自我,完善自我。高校大学生应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主动参与各类劳动活动和公益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际行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实现外化于行。

2. 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大学生由于受年龄、社会生活经验的限制,辨别是非的能力相对较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内容的纷繁复杂,多元思想文化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空间。因此,应提高大学生明辨道德是非的能力,督促大学生时刻提防消极思想的腐蚀,帮助大学生坚守道德底线。此外,大学生应时刻警惕消极网络思想内容的影响,自觉做到文明上网,遵守网络道德,呈现出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同时,大学生自身应以坚持以德才兼备为成长目标,自觉树立崇高远大的理想,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立时代德行,求真才实学,做合格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

(摘自《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3期)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探析

文 / 庄兴忠

爱国主义是人们把自己的利害得失与国家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深厚情感，它集中地表现为崇高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表现为争取和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繁荣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性的历史阶段，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需要从爱国主义教育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动力源。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为“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理应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力度。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全面融入思政课教学之中。同时通过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丰富实践教学载体和网络媒介载体作用，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一、问题的提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新时代“要把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广大青年也“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弘扬爱国主义……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进步”。新时代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趋于复杂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面临各种挑战和问题。

第一，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不良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是从历史领域入手，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妄图通过否定历史扰乱人们的历史价值观，具体的观点主要包括：一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党的领导，诋毁英雄人物，解构英雄人物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形象，以此蛊惑人心、消解人民理想信念。二是美化侵略扩张，为侵略者开脱，甚至宣扬“侵略有功”。三是恶搞戏说历史事实，大肆解构历史名人，任意颠覆文化常识，扭曲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它无视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为实现救国救民所进行的艰难探索，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无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视中国在促进人类社会和平发展进步事业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基本事实，而是揪住我们在探索和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与问题不放，以偏概全，以支流否定主流。历史虚无主义常常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或以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等形式影响社会舆论，带有很大的迷惑性，会干扰大学生正确的思想认识。对于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来说，历史虚无主义传播会“挖掉爱国主义的历史根基，抽掉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基础”。这一错误社会思潮的存在严重影响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不可避免会给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第二,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淡薄。如一些大学生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缺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等。二是民族感情淡化。个别大学生对国家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淡忘历史,缺乏文化自信、缺少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三是社会责任感缺失。部分大学生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观念,对国家和社会问题冷漠,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缺乏基本的奉献精神。四是部分大学生中存在非理性爱国主义行为。表达爱国情感是大学生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但当前部分大学生中存在一些非理性爱国主义行为。“以网络空间为主要代表的舆论场域,弥散着情绪化、非理性和极端化的爱国主义感情”。如将是否购买国产产品等作为衡量是否爱国的唯一尺度。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容易助长不遵守社会秩序、藐视社会法规的错误思想观念,也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持续推进。

第三,高校思政课教学还存在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思政课教师爱国主义教育意识不足,缺乏对爱国主义历史的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缺乏了解;对各种错误思潮缺乏敏感性和鉴别力;对学生提出的有争议性的社会热点问题难以进行有效引导。二是课堂教学效果有待提升。就教学内容的整体性来说,由于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繁多,学时有限,思政课教师大多关注自身领域的问题,思政课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系统性有待强化。同时,受一些思政课教师自身理论素养不高,教学创新手段不多等因素影响,如何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让思政课真正成为有温度、有情感、有魅力的课程依然是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重要难题。三是教学载体作用的发挥存在制约因素。以思政课实践教学来说,实践教学是推动大学生了解国情,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途径。但当前一些学校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缺乏整体规划,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评价等,致使思政课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二、历史维度: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全面融入思政课教学中

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先秦时期是爱国主义的形成时期。在《战国策》中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的记载,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也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记载。之后,爱国主义一直延续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刻。中国仁人志士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林则徐被流放边疆仍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曾有逃走的机会,但他坚持不走,决心为变法流血牺牲,以此来唤起民众的觉醒。临刑时,他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孙中山在领导和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在五四运动中，广大爱国学生明确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战斗口号，同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作了坚决斗争，形成了各阶级、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使五四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爱国主义运动。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救国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即通过革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实现民族独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爱国主义主要体现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就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表明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爱国主义史诗。

总之，爱国主义源远流长，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之中。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求我们必须传承好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全面融入思政课教学中，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全面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内涵丰富，具体包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民族压迫、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家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爱之‘国’在地理、政治、文化等内涵上有所差异。”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毕竟都是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产生。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必然会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我们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还需要注重推动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来说，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分析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如将传统爱国主义中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当前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增强大学生使命感、责任感结合起来，引导新时代青年大学生要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再比如将传统爱国主义中促进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当前维护国家统一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反对不利于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和言行等等。

第二，全面融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使命追求，自觉把爱国家与爱民族、爱人民、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不仅如此，在党带领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提出一系列爱国主义思想。可以说，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教材，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是助力高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营

养剂。党成立百年来，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围绕着爱国主义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爱国主义与民族复兴、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内容展开。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全面融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有利于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而且有利于大学生深刻认识爱党、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

三、课堂教学维度：在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在高校各种教育活动中，课堂教学是最基本、最重要、最稳定的教育活动，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注重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而且要牢牢把握好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通过提高思政课课堂教学质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观念，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针对当前大学生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要求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必须坚持“破”“立”结合，提炼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教学内容，强化唯物史观的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辨别是非，进而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第一，突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教学目标，阐明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爱党和爱国、爱社会主义是高度统一的。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要突出这一目标导向，阐明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尤其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指明方向，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实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高校思政课要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的历史过程，以深刻的理论、丰富的历史实践生动阐述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二是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关系，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动者、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特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使大学生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三是说清楚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的优势，让大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要求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包括发展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的优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国家统一稳定的优势等等。通过阐述好上述理论，让大学生感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深刻认识祖国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

第二，推动多课联动，促进协同育人。目前高校思政课有五门课程，但各门思政课教学目

标、内容有差异。因此,要提升思政课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就必须要有系统思维,做好顶层设计,明确不同课程知识要点和讲授重点,推动多课联动。一是“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要突出开展中国精神教育,阐述好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激励广大青年自觉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道德修养。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要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同时加强大学生唯物史观的教育,帮助大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问题,推动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三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深入开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思政课教师尤其要讲清楚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四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引导大学生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等等。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要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历史地位,讲清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最大优势的内在缘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表现等等。

第三,深入推动问题导向的专题式教育,在解疑释惑中增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思政课专题式教学既立足于课程大纲,又注重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直面大学生思想疑惑,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导论部分可以专门设置专题“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特质。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可以专门设置专题“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生根中国的?”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设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飞跃”专题,重点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内容体系和历史地位等。此外,为了提高思政课专题式教学成效,还应坚持问题导向,即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有争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

第四,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是提升思政课教学成效的必然要求。一是持续迭代升级“互联网+一化六制”思政课教学改革,融入艺术思政元素,落实“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案,增强思政课教学的互动性、信息化、沉浸式,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二是加大案例教学力度。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涌现了一大批热爱祖国、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爱国英雄人物。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有意识强化这方面资料积累,有意识建立爱国主义教育案例教学库,并将之融入到日常教学之中,从而将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活生生的案例,让英雄人物的形象变得可亲可近可靠可学。三是教师要善于运用多媒体信息化教学。思政课教师要善于收集、制作各种教学微视频和各种教学素材,开发设计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在理论讲授和教学互动中利用生动形象的视频、动画及图片等增强教学感染力,使学生形成强烈的情感参与和情感体验,推动大学生从感情触动到理性思考,真正了解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第五,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理论素养,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保证。教育部门和高校要通过多种措施提升思政课教师政治素养和专业知识,包括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开展国情考察、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研讨、接受各类相关培训,开阔其视野,提高其爱国主义认知。同时支持思政课教师到各级党政机关挂职锻炼、下基层蹲点调研。高校还可以建立特聘教授、兼职教师制度,积极聘请有关领域的专家等到高校担任爱国主义教育兼职教师,进一步增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力量。

四、教学载体维度:在丰富实践教学载体和网络载体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联动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教育教学才能实现培养人才的整体目标。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调动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信息化深入推进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还需要注重发挥网络载体的作用,积极探索网上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第一,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高校校园文化具有人文润化和教育的功能,是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积极健康的高校校园文化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等。新时代高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要注重对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进行总体规划,将爱国主义教育要求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之中,如结合学生专业特长,学校编创歌曲《妈妈的生日》《红色的骄傲》等,创编原创歌剧《五星红旗》、原创舞蹈《燃·薪火》、诗朗诵《大爱中华,点亮希望》等。在重要节日和重大事件中要注重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如在国庆节、建军节、建党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用好用活爱国主义实践教学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直观最立体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爱国主义教育力度不断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断拓展。高校在思政课教学中需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善用社会大课堂,积极开展与各种教育基地的合作,如遴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地、国旗广场、博物馆等。通过用好用活爱国主义实践教学基地,引导大学生更直观了解国情、了解历史,通过参观学习坚定崇高理想信念,培养爱国情怀。另外,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本身还要积极搭建“互联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上展馆与实体馆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可视、可听、可触、互动参与性强,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真实、立体的冲击,增加参观者的参与、互动,达到全身心的融入、沉浸和情感体验,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感染力。

第三,组织大学生开展广泛的实践活动。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丰富知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途径和渠道。新时代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尤其要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一是把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并将其作为对学生进行年度综合考评的标准,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保证。二是创新实践教学形式。高校在组织实践中,可以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指导下,通过情景式教学、微电影展示、专题式调研、公益性服务、虚拟仿真实验等项目化实践,并通过在线填写实验报告或线下填写《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与实践手册》,深化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落细落实落全。三是设立大学生思政课社会实践专项资金。联合教务处设立特色实践专项经费、争取设立校友基

金等方式，确保社会实践顺利进行。

第四，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载体作用。在信息化不断深入推进的条件下，网络教育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尤其是移动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也要适应信息化的要求，加大网络教育力度。一是在校园门户网站、校园移动APP 和官方微信平台上加大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力度，包括定期投放宣传视频、宣传英雄模范事迹，弘扬奉献精神；二是鼓励广大师生将先进事迹以及身边人的爱国小事通过短视频、朗诵音频、歌曲创作、动漫绘稿、书画、摄影作品、网络文章等形式展示出来，在网络平台推出宣传，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传递爱国主义思想，让爱国主义思想进头脑、入心灵、见行动。

（摘自《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的 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

文 / 张贵礼 程华东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高校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育人功能，在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中明晰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和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培养人的问题，并形成不断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育人实践进路。

一、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的逻辑理路

文化一直以来都在育人过程中发挥着凝聚人心、成风化人的道德教化和价值引领作用。在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中，文化育人资源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一套逻辑系统。

1. 历史逻辑：在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得以沉淀和形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建党精神，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双百”方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高校文化育人在党的文化建设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育人体系。

高校文化育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文化育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方位”和“位置”都取决于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文化育人就会迷失方向,无法准确找到育人的“坐标系”,更无法正确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高校文化育人能够正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障,让高校文化育人的底色更加鲜亮、方向更加明确、目标更加清晰、路径更加丰富,为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提供了精神指引。

高校文化育人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华网和教育部联合组织开展了“网上重走长征路”党史故事百所高校接力讲述活动,深入挖掘高校自身发展历程中丰富的党史资源。无论是北京大学所讲述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故事,还是华东师范大学所讲述的新四军战士的故事,都生动地诠释了高校文化育人赓续红色血脉的历史传承和使命担当。

高校文化育人始终体现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高校文化育人的各方面。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7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强调,开展高校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研究制定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师生行为规范。一系列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出的要求体现了高校文化育人与与时俱进的特质。

2. 价值逻辑: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得以丰富和发展。新时代,高校必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文化育人的路径、丰富文化育人的载体、提升文化育人的实效。

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价值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育人自信根源于文化自信。对大学生而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他们认识个体、集体、国家、世界的价值坐标和文化依据,也是他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来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阶段锻造出的以建党精神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理想信念之源、精神品质之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培育理想信念、家国情怀、道德品格的重要文化力量。历史的、革命的、先进的文化滋养着学生的心灵,培育着学生的情怀,砥砺着学生的品格,不断凝聚起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共同意志和强大力量。

坚持“三全育人”的内在价值导向。文化育人能够有效将育人主体、育人时间、育人空间贯通起来,成为“三全育人”最富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全员育人要求高校形成“人人想育人,人人能育人,人人会育人,人人思育人”的文化氛围和支持环境,这也是

文化育人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中包含制度文化、师德文化、朋辈文化等。全程育人要求高校形成“时时要育人，时时想育人，时时能育人”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沉淀出具有校本特色的典礼文化、重大时间节点活动育人文化等。全方位育人要求高校营造“处处事事可育人，处处事事都育人”的校园文化环境，赋能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等，让育人的力度同温度共存，育人的效度同深度共振。

育人质效评判的内在价值选择。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高校文化育人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有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育人能量，有利于凝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高校文化育人始终贯通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之中，不断推动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3. 实践逻辑：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得以检验和升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就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内容、通过文化的载体和方式来教化人、教育人”。高校文化育人的实践逻辑就是要用文化的力量完成对人的培养和塑造。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高校文化育人的重要使命在于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让学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征程中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高校在文化育人中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坚定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聚焦革命文化，让学生从建党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汲取精神动力，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矢志永久奋斗，在实践中彰显革命接班人的精气神；聚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深刻领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核。

推动着高品质高品位校园文化的形成。校园文化承载着高校的育人精神和价值追求，是高校文化育人的重要构成部分。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后者也是前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高校文化育人的现实需求来看，校园文化发挥育人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特性决定的，也是校园文化不断沉淀积累、传承创新的现实要求，即校园文化必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育人使命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同时，高校文化育人的过程，也是师生对校园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有利于推动校园文化高品质高品位发展，让校园文化真正服务于育人。

切实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高校要在文化育人中引导学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要在文化育人中引导学生成为骨气充盈的中国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力量，在它们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树牢“四个自信”；要在文化育人中引导学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担当力行，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前进。

二、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的实践进路

高校文化育人作为新时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的重要抓手，需要高校以主动的历史担当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从组织运行、师生融合、内容供给、创新发展、资源整合等方面发力，逐步构建起符合校本育人实际、满足校本育人需求的文化育人体系，强化文化育人实践，通过文化育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和育人质效，实现文化育人内涵、载体、样态等的丰富和发展。

1. 从组织的角度出发，完善文化育人中的运行机制。巴纳德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的存在和持续运行取决于合作意愿、共同目标与信息沟通三个核心要素在系统中的动态维持。要想提升高校文化育人的效果，就必须优化其运行机制。首先，要进一步激发相关职能部门、管理与服务单位间的合作意愿。通过不断深入的教育思想大学习、大讨论，让各部门在思想认识上达成共识，形成既能破圈出界深度参与文化育人公共事务，又能深耕“责任田”，开掘具有独立性、参与性、互动性的文化育人资源。其次，要进一步明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育人的共同目标追求。高校要充分认识到文化育人是贯穿办学治校特别是人才培养的各方面的，相关职能部门、管理与服务单位的文化都应服从于育人这个主要目标，避免不必要的育人力量耗散。再次，要进一步形成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高校文化育人不能“单兵突进”，要建立起党委领导、多方参与、部门协同的文化育人议事机构，如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等，统揽协调、强化沟通、形成合力。

2. 从主体的角度出发，构建文化育人中的师生共同体。高校文化育人必须牢牢把握住教师和学生这两个主体，并将构建文化育人中的师生共同体作为一种育人导向，不断提升文化育人的覆盖面、融入度和牵引力。从学生这一主体的视角去看，大学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的黄金时期，离不开厚重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滋养；从教师这一主体的视角去看，承担起育人使命的过程就是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相统一的过程。构建师生共同体一方面要建立常态化的师生互动交流机制，无论是规章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是具体文化活动的安排，都要积极围绕促进师生常态化互动交流展开，为师生共同体构建提供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另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师生互动交流的载体，用好用活新媒体平台。院校层面也要基于文化育人谋划设计、组织举办活动，并引导师生自由组合、自行设计、自发参与。要注重文化育人中主导性和主体性的统一，引导师生深刻认识文化育人的强意识形态属性，确保文化育人方向，激活师生主体性，让师生成为文化育人的参与者、受益者、贡献者、推动者。

3. 从需求的角度出发，优化文化育人中的内容供给。当前，“00后”已成为高校学生群体的主体。他们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对象，也影响着高校文化育人的供给策略。因此，高校文化育人必须对“00后”学生群体进行“画像”，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具有开放性，对社会中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和边缘性群体的宽容度颇高，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群体文化认知。另一方面，以“饭圈文化”、二次元文化、恶搞文化和佛系文化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蓬勃发展。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主流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共存共融的状态。基于对“00后”群体的文化认知，高校在优化文化

育人的内容供给上要进一步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学生知识学习、价值观树立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同时,高校也必须鼓励和支持教师结合学生群体特点,有针对性地转化话语体系、教学体系、实践体系,让有意思的课堂同有意义的内容同在。高校还要进一步挖掘文化育人的内容,采取有效办法提升主流文化同亚文化的结合度、贯通度,并善用“抖音”“B站”“知乎”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内容覆盖。此外,高校还要善于吸纳学生群体中的各类人才为我所用,让文化育人内容在挖掘的过程中更加符合学生群体的诉求和需要。

4. 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坚持文化育人中的守正创新。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要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做到守正创新,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首先,要继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力量。注重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丰富其价值内涵和呈现样态,让其同高校文化育人现实需求相结合,展现文化的新魅力。其次,要推动文化育人创新性发展。要注重使用展陈、展演等方式和声光电技术、数字技术等,实现时间、空间的交错轮转,增强文化育人的感染力,丰富文化育人的表现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诸多文化元素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如华中农业大学举办了以当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为主题的展览,以此庆祝建党100周年。该展览将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平面设计、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多种形式有效结合,以强有力的逻辑性和文化感染力引导师生沉浸式观展。再次,要丰富文化育人载体。高校要增强文化育人载体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育人的现实需求出发,将文化育人的线下资源、线下平台同线上资源、线上平台贯通运用,形成合力。

5. 从运用的角度出发,重视文化育人中的资源整合。高校文化育人的实践性要求高校注重文化育人资源的整合,实现文化资源的科学使用,形成完善的文化育人资源运用体系。高校要加强对校本文化育人资源的挖掘和研究,特别是发挥校史、校训、校歌、校风和校园建筑景观等文化资源的价值,设计文化体验活动,推出系列文化衍生产品,引导学生感知文化魅力,领悟文化内涵,培育大学精神。高校要强化协同,增加“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联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嵌入课堂教育教学,有效融入以文艺体育项目、志愿公益服务、创新创业创造、实践实习实训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课堂”,提高文化育人效果。高校还要做好内外联动,推进校外、国外文化育人资源的使用。对校外国内的文化资源要善用之,如举办高雅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等进校园活动,滋养师生心灵,坚定师生文化自觉,厚植师生文化自信。此外,还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借鉴和利用校外国外的优秀文化资源,正确认识文明的多样形态,不断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在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中实现育人。

(摘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4期)

高校专业课教师 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提升探析

文 / 年亚贤 王政

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协调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专业课教师的希冀。“课程思政即以课程为载体,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自身固有的德育因素和资源,遵循课程教育教学规律对其加以开发运用的社会实践活动。”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纲要》强调,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要推动广大教师进一步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

一、新时代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提升面临的困境

课程思政改革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校专业课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但在课程思政的实际落地过程中,由于部分专业课教师在挖掘思政元素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迟滞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进程,导致部分专业课教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发挥,不利于整体育人效果的提升。

1. 协同机制不健全。课程是育人的载体,育人是教师的神圣使命。课程思政建设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强调教师应在立德树人理念的指导下,充分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融汇于课程教学中,从而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部分专业课教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单纯嫁接思政元素”“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进程。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专业课教师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在高校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协同育人的实际过程中,做“四有”好老师、成为“四个引路人”、做到“六要”,这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核心要义和关键环节。

2. 挖掘思政元素能力欠缺。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主渠道,有针对性地挖掘专业课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是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任务。为此,专业课教师既要重视知识体系的传授,又要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深挖专业课程中蕴藏的思政元素,促使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得益彰。但是,目前部分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重视不够、自身学习不足、精力投入不足,挖掘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的能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作为政治原则、作为思考和谋划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在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专业课程内容、素材或具体教学活动中挖掘潜在的思政元素,做“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

3. 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就要求专业课教

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主渠道，紧密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和未来的就业趋向，用好红色资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强化高等教育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切实增强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之中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但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部分高校未能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作为“硬指标”纳入年底绩效考核以及建立专门的思政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课程思政建设的进程。

二、新时代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提升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校在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专业课教师育人能力提升直接关系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大局。因此，提升课程思政教师的育人能力对于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推动意义

1. 强化立德树人意识，创新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为此，高校一要加强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设立课程思政建设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师德师风及教育教学管理，构建以育人为中心的课程思政建设品牌团队，着力打造高素质的课程思政教师队伍。二要主动占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在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积极构建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机制，实现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课教师的引领和带动，推动高质量育人工程行稳致远。三要围绕高校思政教学环境、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技能教育与实践能力等，着重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推进以言传身教为重点，育人和育德、育书和育能相统一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同时，高校要注重定期开展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交流会，使教师通过“名师工作室”“教学沙龙”等互相分享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理念、方法等，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创建新时代独具特色的育人模式。

2. 深挖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推进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要把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摆在首位，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主要目的，以此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为此，在教学设计过程中，要注重各学科、各个专业与思政元素的强弱区分及关联度，特别是结合专业特点、专业方向、专业技能，有针对性地剖析阐述，将专业知识背后所蕴藏的思政元素浸润到课堂教学全过程之中。各门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以中医药专业为例：应结合“望、闻、问、切”中医学科特点，把“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一把草药、一根银针”“苍生大医”的理念有效融入教学之中；运用“大医精诚”理念，开展独具特色的、能体现中医文化精神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建设，以教师优良作风促教带学，优化育人环境，凸显师生的“精、气、神”，展现学生的“真、善、美”。要全面营造课程育人和实践育人的良好氛围，促使专业课教师从思政教育的旁观者向思政教育的示范者转变，从知识的“灌输者”向学习的引导者转变，彰显以文化人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为此，高校要积极打造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特色育人”名

片，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知识与技能相统一，积极构建“大思政”教育体系，创新专业课教育、思政课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协同育人机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打造思政育人新高地。

3. 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构建科学规范的课程思政建设评价激励机制。构建科学的课程思政评价机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抛开陈旧的思维模式，以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为标尺，夯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好地激发专业课教师切实履行高等教育的育人使命。高校一要坚持办学育人正确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高校是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场所，是实施教育强国战略的人才高地，要努力打造具有“理论高度、思想深度、价值温度、情感力度、育人效度”的特色育人模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二要坚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等评价理念，彻底改变以往仅注重教师个人评价的做法。坚持做好“三个结合”，即专业课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专业课理论教学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相结合、专业课教育与就业创业教育相结合，促使专业课与思政课同频共振，充分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三要设立课程思政建设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开展示范课程建设、教学研究、培训交流等，在岗位津贴、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绩效考核中向思政课教师倾斜，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教师主体作用，特别是专业课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主动作为，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进行一次思想洗礼。教师队伍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力量，要积极探索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彰显高校文化软实力、构建高校文化育人新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战略实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摘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4期）

高校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困境及改进策略

文 / 张淑辉 高雷虹 杨洋

高校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的主要载体，通过挖掘专业知识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内容，合理拓展专业课的广度与深度。混合式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建设紧密相连，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是落实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但长期以来，一些高校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关联不够紧密，课程思政体系与混合式教学融合不深，过于注重知识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价值引领，导致课程思政线上线下教学实践与所期待的“价值塑造与知识传授同频共振”还有一定差距，亟待面向课程思政育人实践与混合式教学改革要求主动对标破题。

一、混合式教学助力高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一）高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面临育人环境新变化

首先，课程思政建设的环境在变。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适应互联网技术、知识信息化、数字经济、数字化环境下的教学新生态，这些要素的变革与发展将为课程思政适应性增值赋能。其次，教师的角色正在转变。课程思政反映的课程核心理念由教学变为教育，以学生为中心。高校专业教师由传统教学高度关注知识教学，转变为重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教学，转变为健全学生人格的塑造者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者。再次，教学方式逐渐变革。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模式和教学方法，加速推进了教育观念、学习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改革，教学场景发生变化，推动课程思政建设与混合式教学改革紧密结合。第四，学生的角色发生改变。“互联网+”环境下，学生习惯于网络碎片化信息的获取，学习方式呈现个性化与多元化趋势。同时，网络空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负面信息，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更加复杂，大学生意识形态受外界信息干扰更大，在网络思潮下容易出现价值迷失，这些都对其知识与技能、信息化意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提出较高要求。

（二）混合式教学改革为课程思政建设与发展提供新路径

混合式教学是教学时间、空间、方式、评价的混合，服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度融合在线教育与线下传统教学，将两者的单元要素有机整合匹配，优势互补，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延展课堂教学空间，重新划分教学环节和教学功能，实现深度学习。课程思政建设逻辑起点和价值遵循是“三全育人”，以德为先。而混合式教学改革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整合与超越，为实现高质量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了载体。混合式教学改革赋能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将科学意识形态、价值引领因素融入教育教学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程的关联性，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实现专业课程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可见，混合式教学与课程思政的逻辑和价值诉求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创新课程思政模式的重要手段。

二、高校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胜任力不够

专业教师应具备的胜任力要素包括个人特质、思政认识、知识技能、价值与态度等的综合，这是胜任力理论以及“冰山模型”阐释的胜任力要素与结构。但高校部分教师只注重知识传递

与技能培养,注重自身“智育”角色,关注专业课程内容的深度,而对“德育”角色认识不足,忽略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与塑造。一些教师课程思政理念缺乏,未经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训练,比较缺乏以明辨是非能力为核心的政治能力和理论定力,意识形态属性弱化;缺少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和意识,对学生学习动态和思想认知等方面关注明显不足。一些教师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能力不足,对自身思政教育主体认识存在盲点,对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认识不足,不能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与育人价值,或是盲目扩大教学中的“思政”内容与规模,甚至生搬硬套“课程+思政”,无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线上线下教学中,不能将学科专业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易造成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另外,教师信息化教学素养、信息技术能力、适应信息社会能力参差不齐,课程思政在线教学设计和任务不合理;教师使用信息化资源平台单一,课堂互动性较差,对高阶思维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

（二）学生个体与学习环境交互作用发挥不足

学生的学习和认知能力、心理特征等是影响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内在因素,但学生个体心理系统和自主学习与学习环境交互作用发挥不足。学生具有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与其学习互动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可能改变学生的特质。部分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差,共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相互影响力不足,缺乏成就感、归属感、方向感,对学习环境影响产生潜在影响力,直接影响着教学资源的选择。同时,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操作不当,也将影响学生个体心理。如若课前预习准备不充分,线上教学与学习方面监督与互动不足,线下翻转课堂学习流于形式,就难以实现课程思政育人把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信念。另外,学习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方向,削弱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下降,影响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预期效果。

（三）专业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影响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关键要素是评价体系及保障制度。但现阶段高校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标准缺乏,评价内容单一,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持和激励机制。相关考核评价制度侧重成绩测评,较少考查学生“德育”方面的教学成效,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难以落到实处。大多注重论文、项目、获奖等科研评价指标与教学评价指标,并将此作为教师评优、职称、获奖等的主要依据,教师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育人成效方面难以量化而逐步趋于形式化,关注不足。一些专业教师受评价“指挥棒”影响,趋向评价内容,在时间分配、精力投入等方面出现选择性缺位,难以真正回归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

（四）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整体融合力度不够

高校部分专业课程思政体系与合理实现混合式教学融合不深。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虽然能实现系统学习与零散学习的有机结合,但仍存在教学分工线上资源配置不合理、线上线下课程思政元素衔接不紧密、对信息平台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力度把握不到位、不能混融互通、相互补充等问题,导致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要素融合力度不足,在教学中难以形成一个完整闭环。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管理不能完全有效协同整合,教学资源分布、内容结构、资源容量等不合理,且专业课强度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掌握,教学中时常出现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边缘化和散化现象,教师教学容易出现随意化、碎

片化、主观化等现象。这种混合只是拼凑，而非融合，不利于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

三、高校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的改进策略

（一）提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胜任力

首先，提高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提高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素养，在思想上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一致性；坚持“德育”“智育”有机结合，更新教育改革理念，既传播知识又价值引领潜心育人；提高教师政治敏锐性，形成课程思政自觉意识。其次，培育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把好专业课教师能力关与育人关，培育教师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素养与教学能力，推动教师转变为高质量学习的促进者。教师要结合专业特色因材施教，整体设计课程，找准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深用理论，活用案例，构建“立德”“求知”同向同行的课程发展观，实现育人的整体效应。再次，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素养与技术能力。开展全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强化教师信息素养与混合式教学技能，实现信息技术与混合式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贯彻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理念的内在动力，提高教师运用新技术的能力。最后，提高教师课程思政创新能力。增强课程思政的吸引力、感染力，强化思政认知认同与增进行为认同，增强课程思政内容融合能力。建立教师相互交流机制，通过专题报告、优质课堂展示、教学比赛等方式，开展课程思政主题活动。做好课程思政课题研究，做到学科知识性与育人性并重，确保课程思政教育的层次性和递进性。

（二）促进学生个体与学习环境的互动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参与课程思政的主动性，这是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的关键。通过提升学生参与课程思政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学习行为与内生动力，增强课程思政学习动机和认知能力，培育学生重视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心理特质，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其次，增加师生双向互动，提高学生建构知识能力。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目的之一是提高学生自我建构知识的能力，师生互动是提升这一能力的关键因素。通过改善与重置教学环境、丰富混合式教学方式、加大教师教学投入与学生学习融入，推进师生相互讨论交流，师生分享感悟，建立新的教学关系。教师结合专业和社会发展实际，营造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场域与学习氛围，实现知识传递与价值观引导。线上教学师生互动，引导学生全过程参与，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引发学生思考；学生“前置学习”，提高对知识综合、迁移、拓宽及认同能力。线下通过“翻转课堂”面对面交流与沟通，强化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有效把握课程思政方向，增强知识情感交流，感知课程思政育人的“温度”。另外要提高学生获取线上教育平台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各种线上线下教学互动工具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为混合式学习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学生要熟悉常见的信息化教学平台，能充分利用网络主动获取学习资源，要适应传统课堂学习与在线碎片化学习的要求，注重与课程思政资源的多种互动，更新、创建和分享学习资源，缩短学习资源迭代的反馈周期，满足其个性化学习需求。

（三）构建高校专业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

科学确定混合式教学关键性考核评价指标。考查的关键指标要基于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课

程目标与课程教学。课程目标考查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和“注重思想品德、专业技术能力、科学素养的培养”的教学设计；课程教学则从教学资源、内容、过程、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考查，并对教学评价指标开展适用性研究。其次，关注专业课程思政评价的过程导向。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重视实效性，加大学生平时学习状况考核占比，将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有机融合。注重评价内容全面化，从知识、方法、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评价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的表现。将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纳入评教指标，加大立德树人、政治素养在教师考评中的权重，创新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评价体系，建立常态化评价模式。再次，注重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纠正教学评价的唯量化偏向，将定量评价的客观性与定性评价的灵活性相结合，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合理设置评价指标权重，确定适宜的课程思政要素比例，根据线上线下学情进行动态调整。引入有效的跟踪评价机制，细化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体系，以教学目标统筹考核评价环节。最后，构建教学评价双向反馈机制。推进评价主体多元化，构建学生评价、管理者评价、同行评价、专家评价、教师自评的综合评价体系，合理利用“课程设计—实施—评价”教学质量闭环式评价机制，及时反馈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智育”“德育”目标的实现程度。

（四）提高专业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多元融合力度

首先是推动课程思政教学主体融合。促进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混合，推进教学主体的协同共塑，建构新型师生关系。完善协同配合制度、学教协同制度与备课制度，形成意见反馈制度。其次，紧密衔接课程思政线上线下资源。合理分配线上线下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建设“线上课程”教学资源库，做好“线下课堂”互动和拓展，保障线上教育资源与线下教学内容的融通。把握信息平台技术与课程思政教学整合力度，建立价值引导、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融合的课程思政体系，挖掘思政元素和学科专业知识之间有效融合的契合点。发掘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引入的励志典型，应用项目研究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等蕴含思政元素，厚植学生情怀。再次，协同整合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要素。理顺课程思政包含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推进各要素通过整合形成一个完整闭环。建构专业课程“思政育人”的实践共同体，实现融合与对接。最后，拓展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新场景。构建课程思政教育新平台，优化线下与线上学习场境，建设一个知识预习、学习、提高的良性学习生态环境，进而突破时间壁垒与空间限制，将碎片化信息有效整合为完整的知识体系，持续推进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融合发展常态化。

综上，课程思政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课程思政育人是全面性、系统性的工作。混合式教学改革是落实高校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集混合式教学各要素与课程思政建设紧密相连，有助于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实现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的育人宗旨。

（摘自《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3期）

高校应急管理的困境、趋势与完善

文 / 施婧葳

随着风险社会的形成，公共危机出现的频率不断提高，范围持续扩大，影响逐步深远。作为风险对策的应急管理成为各个学科的重要话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高校因人员聚集性、流动性等特点，是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同时高校承担着培养应急人才、促进应急科技创新等重要职能，是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高校应急管理话题越发引人关注，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影响力程度呈逐步上升趋势，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给高校应急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校自主管理必然涉及日常风险控制和应急制度建设问题；另一方面，高校应急措施又实际影响着教职工和学生的基本权益。然而，我国法律并未明确高校的应急管理职权，给高校应急管理实践带来不便。在现实需求急迫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应急体制在应急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和趋势。学术研究需要回应高校对于应急管理的需求，并通过理论创新和体系调整来构建高校应急管理的体系框架。

一、矛盾与反思：高校应急管理的现实困境

高校应急管理是指高校对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职责。近年来，为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高校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其必须承担起保护校内师生人身安全的责任。在“安全优先”价值目标的指引下，高校应急管理的职权范围逐步扩大，管理内容越发复杂，管理手段不断提升。然而，受制于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应急管理法律的滞后性，高校在应急职责扩张需求的背景下，依旧存在着立法供给缺失、法理地位模糊等困境。

（一）困境的缘起：应急职责的扩张

高校是衔接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枢纽，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职能使得高校从一个私人机构转为公共机构，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职能。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规模不断扩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功能。与此对应，高校职能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立法不断扩张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客观原因。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类型多样化和扩张化趋势明显，且多元风险的交织容易引发公共危机，破坏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高校公共安全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应急需求与政府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这给高校带来了新的职能扩张。一方面，高校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应当积极建立和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成为社会风险共同治理的参与者；另一方面，高校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管理者，还承担着维持正常的学校安全、教育秩序以及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免受风险阻断等职责。

以往关于高校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之中，讨论高校自主管理权和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立法所塑造的高校管理体系，也主要围绕教育教学能力和秩序的保障，缺乏高校风险管理和应急能力的研究。但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形成，风险、危机不断增加，高校应对风险危机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张。高校风险治理、危机管理能力能否匹配这种应急职责的扩张，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赋予高校更多的管理工具，以支撑高校在风险社会中的存在

和运行。

（二）困境的激化：立法供给的不足

社会风险的扩张和多元化趋势，促使高校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一方面，高校作为法律所拟制的法人，其行为能力及其范围源自法律的具体设计。提升高校应急管理能力和丰富应急管理手段离不开完备的立法供给和法治保障。另一方面，科技升级和社会发展所推动的风险迭代，要求法律及时更新以回应社会需求。但是，我国教育立法的滞后性和应急立法的不完善性，导致高校应急管理法律供给严重不足。

应急权能是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对管理权能的一种扩张，这种扩张突破一般法理，容易限制和侵犯其他社会主体的基本权益，因而需要立法加以明确的授权和约束。然而，我国教育立法中却鲜有涉及高校应急权的内容。我国教育立法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其中，教育法立法目的主要在于促进教育行业的体制改革和法治进步，《高等教育法》则旨在借助市场经济改革调整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并未明确设计高校安全体系和应急管理制度。此外，我国应急性立法则肇始于2003年SARS事件之后，当时应急立法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初步的应急管理框架，加上立法认识和经验的不足，并未考虑学校，尤其是高校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特殊性，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

由此形成两个悖论：其一，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应急立法仅仅规定社会主体的应急义务，而并未具体设计履行应急义务的手段和工具，导致高校承担较重的应急职责却并不具备相对应的行政应急权能。其二，尽管高校不具备行政应急权，但现实中因履行应急职责的需要，往往行使着法律专门授予行政机关的应急权能。这种悖论造成了高校应急管理的合法性困境：一方面，高校应急管理活动不断发掘应急管理工具，容易逾越立法授权，存在合法性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应急活动的扩张性和强制性，特定应急措施容易影响教师、学生的基本权利，从而引发一定争议和冲突。在危机应对的紧张情况下，这种合法性争议和现实冲突容易进一步衍生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更大范围的危害。

（三）困境的反思：法理地位的模糊

教育立法的滞后性和应急立法的不完善，导致高校在应急法治中的地位不甚清晰。从现实需求来看，高校拥有校园的自主管理权限和经验，能够支撑其在考虑具有独特环境和治理成本的基础上，设计特定应急措施的能力和自由。然而，从立法现状来看，政府机关是唯一的突发事件应对主体，具有全部应急管理权；高校在未被授权的基础上却实际担负着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职责和防止突发事件危害结果扩大的义务。政府享有行政应急权，却不能当场即时应对；高校处于突发事件一线，拥有特定的人力和设施，却不享有行政应急权，没有应急处置的权限和资源。这种权责不相统一的情形，既可能导致应急权力的重合问题，浪费社会资源，也可能因高校应急能力不足或态度消极，导致突发事件的升级和扩大。

尽管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应急预案的方式，不断压实高校应急管理职责，但是由于法理地位的模糊，应急预案及其应急措施也出现乏力：高校应急预案主要规定学校职责，而对应急机制并无着墨，这体现了高校安全立法呈现“重事前、轻事中、无事后”的特点，相关机制聚焦于事前预防而忽视事中处置。这一现状的深层原因在于，高校在应急法治中的地位不甚清晰，高

校采取特定措施容易引发争议，因此无论相关政策文件抑或学校内部应急预案都避而不谈。

高校在应急法治中地位的模糊性，给高校应急的体系化建构带来障碍，更在应急实践中增加了应急管理的混乱。随着公共危机的实践，高校法理地位的模糊性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尊重高校应急管理方面的公共性和自主性，明确高校的应急管理权。这些观点可以分为高校自主权说、政府放权说和自我调节说三种观点，它们都反映了对公共危机高校应对的反思：高校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和权限问题亟待明确。

二、现实与机遇：高校应急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由单向职责转向二元结构

1. 属地管辖和业务指导的双重体制

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实施“属地管辖为主”原则，主要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情况下承担相应责任。教育部通过制定应急预案，进一步解释了属地原则，明确教育主管部门具有处理高校应急管理事务的权力，但需要在属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由此可知，高校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了属地管辖和业务指导的双重领导体制。其中，属地管辖确立了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指导和监督高校履行应急管理职责；部门指导则主要集中在高校教育领域，旨在指导高校维护正常且安全的教育教学秩序。在属地管辖和业务指导之下，高校在应急管理体系中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被动地接受和履行行政命令所设定的应急职责和义务。因此，高校不是应急管理主体，不享有应急管理权，而仅仅承担应急管理职责。

2. 应急职责和自主管理权的二元结构

从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衍变过程来看，高校自治理念将高校从政府附属解放出来。高校与政府关系从单纯的国家控制走向国家监督。政府不断向高校下放自主管理权，由高校在法律规范范围内独立行使的部分行政权，包括学术自由权、教育管理权和教学管理等。虽然突发事件的紧迫性打破了高校自主管理权对政府权力的防守功能，加强了政府对高校的直接管理，但是由于高校自身体系所具有的自主性和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加之高校作为独立法人拥有对自身场所、设施的管理权，因此，政府在应急管理中往往给予高校较大的自主空间，由高校对校区内部进行自我管理。

（二）由自主管理支撑应急行政

尽管立法并未授予高校行政应急权，但是高校在实践中却普遍行使着封闭校园、限制进出校、强制就医等应急权力。如果仅单纯从行政应急权的授予这一视角来看，高校应急措施面临着超越权力边界的质疑。然而，如果从高校自主权的逻辑来看，高校享有对教职工的用人单位管理权、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和对场所设施的运营管理权，这赋予高校可以通过内部行政管理的方式，为教职工和学生施加特定的义务，从而实现高校应急行政的目的。

教职工作为劳动者，具有遵守劳动合同和校内规章制度的义务，高校实现校园安全和维护管理秩序的行为对教职工具有法律拘束力；同时职称评定作为一种内部管理方式也激励着教职工的服从意愿。对于学生而言，高校行使的教育权是一种公共权力，产生服从、支配的影响力，学生入学行为本身就可以视为对高校管理的同意。高校内部行政管理呈现自上而下的单向关系，

高校通过内部行政管理保障高校自主权的实现。

此外,高校是校园公共场所和设施的管理者,能够自主决定校园、教室、设备的运营和维护。因此,在应急实践中,高校通过行使自主管理权,向教职工和学生施加服从义务,实现校园应急的有序和统一。

(三) 由先期处置转向合作治理

传统校园安全主要强调应对校园突发安全事件,涉及警察权力,往往寻求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合作来维护校园安全。社会各界多是站在高校自身能力不足的视角,期待政府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认识下,高校应急似乎更多应当向外寻求支持,这也符合突发事件应对法扩张政府权力来保护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逻辑。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高校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扩大,随后向有关机关报告和转移处置权限。先期处置一方面有助于发挥高校自身的地缘、机制优势,另一方面也通过处置转移引入了应急管理职权完成最终的应急判断和决策。但是,伴随社会风险的多样性和频繁性,高校应急形成了能力与责任的错位,即高校作为校园安全的直接责任人却并不享有应急权限和资源。政府作为应急权限和资源的享有者,却不能在第一时间进入应急处置。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不仅频繁而且规模较大,政府作为应急权的单一主体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广泛的应急需求,在此情况下,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亟待吸收更多的社会主体进行合作治理。在突发事件的合作治理中,这里的“合作”更强调的是发挥社会组织自主能力和内部结构的优势,实现社会自治,以减轻政府部门在应急管理方面的压力,实现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应对。高校自治更是成为公共危机下突发事件合作治理的集中体现。在合作治理中,政府与高校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通过目标、工具、过程的沟通,共同成为应急管理的合作主体。

(四) 由教育管理转向社区维系

关注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传统研究总是将高校视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教育主体来看待。但是公共危机的发生,给高校身份带来了新的变化,高校内部出现了新的形态,扩张了高校作为教育主体身份之外的权能范围。在一个高校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教育和生活需求使得高校不断扩张,具备了公共管理学对于社区要素的界定,包括地域、人口、生态、结构和社会心理。现实中,一些高校甚至形成了相互区分、相互补充的教学办公、住宿生活、体育休闲、消费医疗等不同区域,公共服务完善程度超过绝大多数街道社区。正如克尔所言,“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大学的触角遍及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因此,高校一方面形成了一个现代化、区域化的生活共同体,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主体机构实施管理功能来维系社区的正常运行。由于公共资源的紧张,高校社区成员的需求与政府供给之间存在矛盾,这决定了高校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的必要性。公共危机的出现加剧了这一矛盾,并且增加了高校作为社区维系机构的服务压力,这种压力进一步增加了社区之间相互合作的紧密度。

公共危机会倒置社区系统的运行逻辑,使社区从开放的生活系统和封闭的管理体系转变为封闭的生活系统和开放的管理体系。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阻断高校与社会在生活方面的联系,同时要求更多的高校社区成员参与到社区自治之中,共同维系社区公共安全。公共危机下的高校社区自治,是应急资源匮乏情况下社区成员的合作自救,在紧急情况下形成了权利

义务调整的“社区契约”，从整体上反映了社区成员的意志和态度，那么基于共识的应急措施就具备相当的民主性和可行性。除非这种社区自治造成了社会撕裂，否则，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只会肯定这种高校社区自治的方式和效果。

（五）“放管服改革”带来重心下移

放管服改革的理念是政府通过教育分权和行政放权，提升高校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以回应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放管服改革并不是一个临时的目标，而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它的影响在于指明了教育管理权重心下移的倾向。如果说科研管理、职称评定等涉及政府、市场利益，容易引起争议，那么应急管理权涉及高校安全显得更为简单明了，而上述高校应急管理实践的趋势则共同佐证了行政应急权重心下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放管服改革重在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变政府管理理念，通过下放特定权限提升公共管理效率，激发社会活力。因此，优化政府服务的出发点是从社会需求而非从政府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无论从高校风险治理还是师生安全来看，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不仅可以在教育体制和管理机制上进行精简放权，还可以总结高校应急实践经验，下放部分不该由政府直接行使或者更适合由高校自主行使的应急管理权能，破除高校应急管理职责与应急管理资源之间的张力。

三、方案与路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下，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呈现出高校履行安全职能的自治特征，而且逐渐形成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权力让渡，即高校管理组织通过政府放权和受教育者授权的方式，维系着疫情期间高等教育的正常运行。如何规范、引导和约束高校应急管理活动，成为后疫情时代高校建设的重要课题。基于此，亟需反思和总结高校应急管理经验，明确高校与政府、师生在应急管理体系运行中的关系，促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本文认为，完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需要设计化解高校应急困境的方案和路径，从宏观层面解决四个基础性问题，即高校应急立法、应急赋权、外部关系衔接、内部关系协调。

（一）高校应急立法的路径选择

完善高校应急立法，是化解高校应急管理困境的前提。一方面，通过立法明确权能层次，厘清主体关系，保障应急管理秩序的有序；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吸纳高校应急管理的有效经验，构建完整的高校应急管理体系和机制。完善高校应急立法主要有专门立法、部门修法和分类部门修法三种路径选择。

专门立法路径是指制定专门的高校应急或校园安全法律规范，集中规定高校开展应急管理活动或维持校园安全的权限、措施、程序和责任。从高校应急管理的现实需求而言，专门立法能够直接、全面地考虑高校应急的特殊性，设计有针对性的规则，是最为直接、有效和全面的路径。但是，考虑专门立法所需的资源之多、历时之久，也是立法选择中最为困难的一种。早在1999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呼吁制定校园安全法，但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研究和立法经验，迟迟难以出台。部门修法是指通过修改应急部门立法或者教育部门立法的方式来明确高校应急管理的法律规范。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应急部门立法，或者通过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部门立法的方式，设定专门的高校应急条款，明确高校应急管理的权限、范围等内容。部门修法方式相对分散，需要更好地衔接应急法

与教育法的关系,以免形成立法重复或冲突。因此,本文建议采用分类部门修法的方式,即应急法和教育法的修改分别侧重高校应急的不同领域,形成相互补充的规范体系。具体而言,应急法修改侧重授权和设计高校应对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机制,教育法修改则侧重将高校维护教学教育秩序、校园安全和师生健康安全的职责予以具体化。这种路径形成了常态化安全秩序和突发情形下应对处置的二元结构,针对不同目的和职能内容进行相应设计,有助于规范和约束高校应急管理活动。

(二) 高校应急赋权的路径选择

疫情防控的经验告诉我们,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需要政府将治理重心下移,向高校放权,赋予高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的自主权。一方面,高校在现实中确实行使着行政应急权,如果不赋予相应职权会造成规范与现实的撕裂;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明确的规范支撑和引导,高校应急活动也存在侵犯师生基本权益的可能。本文认为,立法赋予高校行政应急权,即明确高校在何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涉及高校应急活动的范围和边界,可以采取概括授权、类型化设权和情境建构权相结合的混合方式。

立法可以通过概括授权条款,明确高校的行政应急权。例如,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规定,“高校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采取措施应对校内突发事件和防止校外突发事件对学校的影响”。概括授权方式的优点是,一方面在明确赋权的同时设定了该职权的立法目的和判断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宽泛的表述为建立高校自主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创设应急管理措施提供一定的裁量自由。通常而言,概括授权规定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还需要具体化设定来予以补充和完善。

概括授权下的具体化方式,有类型化列举和情境化设定两种方式。类型化列举是立法按照一定标准将具体活动予以类型化,明确列举出高校可以采取的措施或者不能采取的措施。如果明确列举高校可以采取的措施,则高校不能行使列举范围之外的职权;如果明确列举高校不能采取的措施,则高校可以采取这些被禁止的措施之外的所有措施。类型化列举方式有助于细化高校相关突发事件的类型和影响等级,明确高校在不同类型、等级的突发事件中所享有的不同职权。此外,高校可以在编制应急预案中,通过情景建构的方式将概括授权和列举范围进行具体化设定,即当高校发生何种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发生何种危害时,高校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采取措施的范围、幅度和限制。

(三) 高校外部关系衔接的路径选择

高校自主权的本质是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高校开展应急管理活动本身就涉及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需要厘清高校与政府在应急管理活动中的权限关系。一般而言,立法授予或承认高校行政应急权,可以视为政府放权或者行政应急权的下沉。在此背景下,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立法并不明确授权,而由政府向高校派出应急管理机构,负责高校应急管理活动;二是立法明确或者委婉赋权,由高校采取应急管理活动,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接受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协调。

长期以来,学界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向高校派出管理机构,即主张借鉴美国校园警察经验,设立高校派出所,维护高校安全秩序。这种模式解决的是高校不具有校园安全执法权的问题,与高校缺乏行政应急权的问题如出一辙。但是,考虑行政资源的紧缺性和高校应急管理的自主

性和便宜性优势，如果采取政府排除应急管理机构的方 式，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在多数情形下反而需要考虑高校特殊情况和配合高校内部决策。相比之下，明确高校行政应急权，并建立即时处置——实时报告机制，既可以实现应急管理的常态化、应急处置的即时性，也可以实现对高校应急活动的监督。

首先，政府与高校在应急管理中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高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应急管理机制，高校实施应急处置活动应当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监督。其次，高校处理校内突发事件具有一定自主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应急决策，采取相应应急措施，但不得超越立法授权的范围，政府机关应当尊重高校在授权范围内作出的合理决策和措施。第三，高校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之时，需要向政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突发事件情形、所采取的措施和程序等。政府相关部门有权撤销或者纠正高校违法或失当的应急措施。

（四）高校内部关系协调的方案选择

在应急处置情形下，由于应急措施必然对师生权益造成一定克减，因而应急措施的可接受性和认同度成为校园秩序稳定的主要内容。因此，在突发情形下更应该注意通过高校内部关系的民主性，塑造高校内部共同体，提升高校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的效率和效果。从突发事件应对的内容来看，高校与师生关系可以分为管理关系和处置关系两种，前者是指高校与师生形成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后者则是指高校的应急处置限制或者减损了师生的基本权益。

与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逻辑相同，实现内部治理也是高校内部管理发展的趋势。应急管理涉及特定情形下权利义务的再分配，应急体制和机制的建构关乎每个高校师生的权益。如果在日常的应急管理中，注重民主参与，扩大在校师生参与应急管理、规则制定，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高校管理与师生权益的协调统一，进而实现高校应急管理的共享共治。构建良性的应急管理关系，既是保护师生基本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民主监督和促进高校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措施。

在处置关系中，由于高校应急处置措施会直接限制和减损被管理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活动，因此容易引起被管理者的不满和反抗，如果不能予以纾解，很容易形成负面社会心理，诱发综合性突发事件。如果在应急处置过程中重视程序正义，通过对话协商方式明确应急处置的必要性，尽量尊重和照顾被处置一方的基本诉求，就能够通过应急处置的教育引导功能来促进应急管理秩序的稳定有序。而从大学治理的宏观角度来看，加强协商民主具有提高高校公共决策的质量和维持秩序稳定的双重意义，是调和应急处置强制性、处分性的必要工具。

（摘自《江苏高教》2023年第5期）

整体性治理：我国公立大学 内部治理的理念与策略

文 / 王申 陈国秀

公立大学内部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发挥大学内部治理的积极作用,是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治理现代化并非是由外至内的强加,而是新时代中国大学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诉求。理顺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尤为重要,尤其是解决大学内设部门沟通不足、协调乏力、合作缺失、过度竞争等问题,更需要大学组织主动作为,寻求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治理过程的优化,以激发大学建设发展的整体活力和效能提升。走向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当是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必然选择。

本文所说的整体性治理是相对于大学治理中的“碎片化”而言,是为了解决大学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重要治理理念。“碎片化”问题是导致组织内部出现条块分割、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等情况的根源,直接刺激了整体性治理的兴起,整体性治理的对立面是“碎片化”问题。因此,解决公立大学内部管理结构“碎片化”问题是实现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关键。

一、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

管理结构“碎片化”是制约公共组织实现内部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因素。“碎片化”问题的根源在于科层组织过度分工和过度专业化,以及受市场机制作用出现的过度竞争。首先要认清,科层组织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是为了处理复杂事务而产生的,是适应工作需要的结果。分工和专业化并不是管理结构“碎片化”问题的诱因,但是,组织内部过度分工和过度专业化,会出现部门主义倾向,导致信息不对称、沟通不顺畅等负面情况,进而使组织目标与管理行动出现冲突,层级与部门间难以形成互信合作关系,在处置棘手问题时缺乏合作力。纵向层级间产生冲突与隔阂,横向部门间出现利益纠葛,均会使组织管理结构出现“碎片化”问题,同时还要认清,通过市场化机制建立的扁平化、分权式、竞争性的组织环境,旨在取代高度集中的等级结构。它会使公共服务供给和资源配置更接近服务和产品供应本身,反馈更为直接,效率得到提高,竞争机制确实建立了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的局面。事实上,人与人、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普遍的竞争关系。一旦竞争过度,便会诱导组织内部出现逐利性、功利化行动。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会造成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甚至有失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在公共组织中,过于注重自身利益会破坏组织团结、扰乱竞争环境,使组织内部关系出现裂隙,随即产生“碎片化”问题。局部问题会导致系统问题,局部的“碎片化”问题将会触发系统出现“碎片化”问题。

大学作为一个典型的、复杂的公共组织,既有科层组织的特性,也有竞争性、市场化松散联合扁平组织的特征。同样,公立大学也会出现一般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科层弊病和过度竞争等异化现象。在大学内部管理实践中,利益相关者强调部门主义、本位主义,造成过度分工和过

度竞争的情况,致使配置权力与资源时产生矛盾、出现冲突。在对峙的部门关系中,部门间会因缺乏协调整合、对话合作而难以构建信任关系,大学内部管理结构就会出现“碎片化”。大学内部管理结构的“碎片化”问题会破坏或有损大学公共利益,甚至扰乱正常秩序,还会阻碍利益相关者形成价值共识、发挥整体合力,是困扰大学组织发展的难题。

(一)摩擦冲突:领导决策系统中的“碎片化”问题

领导决策主体在组织内部具有最高权力,对各项事务负有全面责任,科学合理的决策行动是实现组织整体目标的前提。当前,我国公立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校长负责”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科层管理。两者共同构成大学领导决策系统,相互之间存在密切交集和重叠关系。人员上的交叉重叠导致权力边界模糊。一旦学校党委书记为主的党委集体和校长为主的行政班子出现摩擦耗散,势必降低大学系统内部的协同效率,不利于大学整体利益的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大学的内部管理活动遵循等级制度,领导决策主体高度集权,位于金字塔结构的上层。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关系主导大学决策行动,造成单一向度的工作控制。受目标取向、结果导向的影响,领导决策主体往往会着眼于追求短期效益,创造外显成绩,注重表面化、数字化的成果。局部的、非系统性的“碎片化”决策,强化短期利益带来的零散回报,不利于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另外,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也可能会形成分散决策的局面。客观地讲,分散决策结构反应灵敏、处理快捷,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决策主体的智慧。但需要注意,人在做决策时,会追求利益极大值或者损失极小值。领导决策行动是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决策主体对最优决策结果的向往是通过博弈得出符合自身利益追求的结论。校领导依据职能部门的信息供给对分管领域事务进行决策,分工和专业化会主导职能部门的价值判断。如何使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或者使本部门的损失最小化便成为职能部门供给信息时的考量依据。经筛选后有限的信息供给造成分散决策结构出现局部和片面的决策行为,导致领导决策行动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二)各自为政:贯彻执行系统中的“碎片化”问题

大学内部职能部门是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决策,支持、服务、保障教师学术发展的基础性部门。在管理实践中,职能部门通常以领导决策层“代理人”的身份,手握“指挥棒”行使管理权并配置资源。面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学生事务、后勤保障、条件支持、财经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在执行决策时会运用授权权威,采取控制性的措施处理内部事务。

为确保决策有效执行,职能部门在处理复杂内部事务时强调效率理性,追求既定目标的实现和利益的获得。当部门行使的公权力与部门利益挂钩,出现行政权力部门化和部门权力利益化,会造成部门间的隔阂或冲突。因分工形成职能本位主义,因专业化出现部门主义。以部门利益为导向采取行动,这种本位主义使组织整体出现缝隙。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片面强调单一指标、片面追求单一目标、片面突出自我利益而忽视整体协同,必将难以满足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另外,行政管理人员支配权的不断扩大,便于行使排他性权力,本位主义会降低其协调整合权力与资源的意愿,容易忽视师生诉求、忽视组织运行中的价值关怀,不利于在组

织内部树立共同体意识，更难以形成顾及整体利益的管理行动。

(三)表面形式：民主监督系统中的“碎片化”问题

对大学内部管理行动进行民主监督，实质是对党政权力进行约束。《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教职工代表和工会会员代表以代理人身份，通过提案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我国现行的教代会制度下，由于教职工享有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缺乏决策力和控制力，表现为缺少权力实现机制。在集权状态下的大学内部监督受制于利益瓜葛和权力共谋，更容易流于形式。“自下而上”的非权力性参与，无法形成对权力的刚性约束，容易使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实施民主监督浮于表面。表面化、形式化的监督是分立的、碎片化的，难以对组织形成一体化的、系统化的监督。代表委员作为教职工的委托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其代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委托人的目标和利益相一致。代表委员的认知差异或行为偏差，存在使代理目标偏离委托人利益的危险。代理人若出现去组织利益的行为，关注实现自身利益，将与委托人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因利益冲突造成组织关系隔阂，使民主监督系统存在“碎片化”隐患。

对学术权力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活动进行监督。当前的学术监督体系缺少主动排查和触发启动机制，多数情况是被动的应答机制，致使学术监督权威性受损。一般表现为，接到投诉再启动调查程序。另外，大学内部涉及学术监管的部门，如科研处、宣传部、纪委、监察室、教师工作部等机构，因缺乏联动协同，部门间沟通不足、各自为政。“学术监督体系只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垂直指挥系统，没有跨部门协作的水平协同机制，就像一个个谷仓缺少沟通与互动”，造成学术监督出现“碎片化”问题。

(四)过度竞争：学术运行系统中的“碎片化”问题

学者以学术能力和学术威望建立学术权力，一般是通过学术委员会影响其他学者。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各学科利益的代理人。在学术权力运行中，代理人往往是站在单一学科立场采取行动，呈现出典型的各自为政和利益本位状态。学术委员会通常是采取一人一票的简单民主，表面上实现了程序合法，但少数服从多数的学术决策方式是否能够真正做出专业领域的准确裁判，有待商榷。很多学术问题不是单独依靠民主就可以解决的，很多时候民主价值取向与学术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一人一票”的办法并非行之有效。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出发，一人一票的参与方式，成本低廉、简单“高效”，避免人情世故的复杂介入，给程序合法包上规范的外衣。事实上，学术决策的实际做法和规范做法有一定的差距，受制于决策过程的有限理性和意见分歧，常常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学术寡头”为了争夺单一学科资源，谋取个人利益，会导致学术发展整体利益受损。

另外，当前的科研成果产出与职称评定联系密切，教师职称与个人收入呈正相关，职称层次高才有资格申请更高层级的课题和项目，重大课题和项目成果又为其职位和职称升迁提供砝码。与教学工作相比，“科研活动可以为学术人员带来更大收益”。以争夺资源为目的，追求短期利益的学术行为会引导学术人员不断更换研究方向，难以构建完整的学术体系。在学术系统内部形成功利导向，进行趋利竞争，会使学术人员之间发生更多冲突和隔阂，造成学术运行

出现“碎片化”问题。

二、整体性治理的核心要义

整体性治理的兴起，是因公共管理实践中部门组织功能表现出的不协调现象，即“政府治理过程中因缺乏充分的交流与合作导致各自为政”以及分权改革环境下的过度竞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现实的“碎片化”问题。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与政府治理具有同构性，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同样存在一系列“碎片化”问题，因此，需要以整体性策略解决“碎片化”问题，“使参与者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呈现相互增强的态势”。整体性治理理论既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治理理论、科层制组织理论的不断探索，更是对公共领域管理实践的持续改进。

（一）整体性治理的内涵

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解决方式，其对立面是“碎片化”问题，它是在价值理念、制度规则、服务供给和技术支持等过程中实现协调整合。一般认为，治理是在一定范围内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维度，在制度规则与协商合作互补的策略下，达成组织目标的行动。公共组织采取协调、整合机制，对组织层级、职责功能、信息系统等方面出现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治理模式。

整体性治理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型治理范式，强调以公民需求和问题解决为治理导向，注重在治理主体间构建协调合作关系，使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不仅不冲突，还要相互增强。整体性治理需要利益相关者在良性互动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树立责任意识，依赖信息技术在透明化、整合化的业务流程中实现合作共享，进而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来实现组织内部关键性的协调与整合。公立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是指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通过协调、整合的治理方式，以便捷的信息技术为手段，在彼此理性相待、协商合作的基础上达成价值共识，实现组织整体性、系统化治理目标的一种行动。它是基于对科层制管理结构和新公共管理实践所表现出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批判反思与修正革新而采取的针对性治理。一方面，整体性治理的先进性体现在对科层制组织理论所形成的正式规则的再深化，同时摒弃权力分层、非人格化带来的“工具理性”冷漠，是超越传统分工原则的理论优化；另一方面，整体性治理取代“新公共管理分散化、独立化和多样化的组织结构，以弥补和修正新公共管理组织结构”，能够解释并引导改善公共管理实践的新变化。

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整体性治理表现出以下优势：一是主张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尽可能满足公民需求为治理目标；二是建立制度或划定容忍范围，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手段，在公共事务中，整体性治理尽量避免使用强制力的否决权，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求同存异甚至求同化异，让产生冲突的各方为达成共识和消弭分歧而努力；三是基于“协调与整合”的系统化视角，实现新旧管理理念的有机融合。整体性治理继承发挥传统管理的层级规则制度意识和政令畅通、一体遵行的传导优势，又通过增加组织间的紧密性、联结性，赋予新公共管理运动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新内涵，推进公共治理实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二）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特征

整体性治理具有专注公共利益实现的合作治理、专注跨越边界的协调治理和专注多元主体

的共同治理三个基本特征。

1. 公共性：专注公共利益的合作治理

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是指与学校事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专任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学生。利益相关者的公共意识和责任感是组织成员之间信任与合作的基础要素，更是整体性治理协调整合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影响着大学内部成员间互信合作关系的构建。在利益相关者公共意识和责任感的构建过程中，尤为看重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行为是否在执行公开标准和对结果承担责任，是否遵守制度规则和追求用最小投入取得最大产出，他（她）们会要求学校必须服务于“标准和责任”所构成的合法性、有效性。治理行动不能与这种合法性、有效性的目标相冲突。公立大学内部公共利益实现的过程，本质上是个体利益的聚合，其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和学校整体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私利。要坚持公共性原则，在公共意识引导下，主动遵守制度规则，进行民主对话与协商合作，在教育服务供给侧实现组织的最大效益，更好地推动大学组织实现合作治理目标。

2. 协调性：专注跨越边界的协调治理

协调是确立协商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观念、权力关系、制度规范和辅助系统等的总合机制，以使承担公共职责的组织在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等方面更有效率。大学组织内部的协调运作机制，可为组织间和组织内部消除沟通隔阂、建立互信关系、提高合作效率提供重要路径支持，也为构建协调治理格局打下坚实基础。对个体而言，大学整体如有机体网络，个体获得发展的同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向彼此契合、相互依赖与有效制衡的方向发展。借助新兴智能技术，公立大学内部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学术和行政系统内部各组成部门之间，以及个人与组织之间能够开展联合性的友好互动，促使各治理主体在学校共同发展目标下，规划行动、科学决策。利益相关者注重对话协商、合作共赢，调动彼此实施理性行为，而不是借用强制性手段或祈求运气庇护来控制他人参与，更不是出于对某些资源或利益的狭隘、无序争夺来诱导其选择逐利行动。

3. 整合性：专注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

整体性治理语境中的“整合”既可指将不同层次的治理行动或同一层次的治理行动进行整合，又可指在一些功能内部进行协调、在部门之间进行协同，还可以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甚至是跨部门、跨学校的整合。人们试图整合大学内部各个职能部门、校级与院系、个人与组织，甚至大学外部一切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资源，以实现更为有效的服务供给，合力输出高质量高等教育公共产品，达致多元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在整体性治理格局下，突出大学内部治理理念的公共性，使多元主体在公共理性引导下，超越各自不同利益表达，为多元主体协调整合资源、协商合作共赢提供依据和理由，形成自觉自愿执行的制度规约和文化规范的共同治理策略，塑造治理共同体，谋求公立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

三、整体性治理是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理念

整体性治理作为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理念，是继科层管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之后在大学内部治理实践中的重大突破与理论创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整体性治理的价值先导，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彼此合作，共同管理大学公共生活，维护内部公共秩序，学校组织与教师

个体是相互协作、地位平等、各自状态最佳的和谐关系。公立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致力于发挥组织间协调效能，整合并积极回应“用户”需求，构建彼此认同且指向公共利益实现的行动框架。

（一）整体性治理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主张协商对话、价值整合

整体性治理基于系统论思维，以整体为核心，兼顾系统内部各要素。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其学术部门和行政部门的组合格特征不能用某一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要用“系统所包含的所有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才能说明。整体性治理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主张协商对话、价值整合，能够明确组织系统一切行动的价值旨归，有助于改变和修正大学内部学术和行政部门出现的“碎片化”问题，为公立大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达成价值共识。

首先，整体性治理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不是其部分的总和，康德则认为整体具有其部分不具有的性质和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整体和部分呈现为一对辩证关系，它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整体性治理承认系统内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和功能，强调处于不同位置的部分都有各自的作用，且各部分之间存在联结性。大学内部学术和行政部门都有各自具体的目标任务，但核心目标和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第二，整体就是整体，它不是“1+1=2”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但整体性治理承认组织的整体作用和功能的是建立在各部分目标达成的基础之上。第三，整体性治理承认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作用和功能是各部分在孤立状态下所无法表现出的性质，要通过有机体才能实现整体价值和系统目标。

其次，整体性治理主张各部分进行协商对话和价值整合。协商对话是指各参与主体(各组成部分之间、利益相关者)之间在相互平等、尊重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沟通过程或活动。具体而言，在大学内部每位成员都享有平等参与学校治理的权利，可为大学发展发表理性议论和建议。对话者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理，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弥补不足、修正缺点，促使大学内部公共问题得到解决。可见，协商对话是具有彼此配合效果的沟通方式，便于促成各部分、各参与主体之间消除各自为政的心态，在相互认可的价值中逐步建构共识。价值整合是指各价值主体通过对话沟通、交往互动，不断调试自身的价值结构而趋向共同价值或核心价值的过程。毋庸置疑，立德树人是我国公立大学的根本任务和核心目标，同样是大学内部各部分、各参与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核心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③。然而，现实中有的部门、有的利益相关者出于对本位利益的关注，使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尽如人意。为此，要发挥整体性治理的系统思维优势，在大学有机体内，推动整体和部分的良性互动，促使各组成部分价值观念的整合，实现大学根本任务和核心目标与组成部分子价值的辩证整合。在此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受共同价值的指引，大学整体与内部要素、内部要素之间进行有效对话，使大学这一系统达到不断优化的目的，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进而提高大学内部治理效能。

（二）整体性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既追求自身价值又最大限度地实现学校整体利益

现代化公民的责任意识，受到主体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的共同约束，以正式制度为依托，

发展非正式制度,采取“刚柔并济”的方式妥善处理制度规约和文化规范问题,满足人对全面发展的需求。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在组织治理过程中,治理客体与治理主体是相对而言的辩证关系。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活动,其间没有绝对的主客之分,是互为治理主体的关系。面对某一领域,一些人可能成为治理主体,另一些人处于客体地位,但在其他领域亦可能进行角色互换。互为主客关系的利益相关者都是治理活动的主体,他们各自受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支配和影响而采取行动。在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组织行为的规定和支撑,使“一些人”实施对“另一些人”行为的规范与制约。大学内部治理主体依据《高等教育法》,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制度安排,实施组织规定的行为,引导或约束“另一些治理主体”开展具体行动。

整体性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秉持主人翁精神,树立责任意识,在实现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学校整体价值和大学内部公共利益。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正向输出便表现为主体责任意识的外化形态。践行整体性治理理念,促使大学内部各治理参与主体树立“荣辱与共”的责任意识,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良性互动建立共同体,协同推动大学内部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实现大学组织的整体目标。

(三)整体性治理强调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良好互动、合作共赢,构建整体性的制度体系

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繁多的内部事务,在“政府化”“官僚化”的层级制度下,大学内部行政权力过于强势,甚至干涉学术事务,侵蚀着大学的根基,可能会导致大学发展背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每一个制度体系下面,都是通过制度建设来推进制度建设,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系统化的、全方位的整体性制度体系。发挥整体性治理协调整合优势,促使根植于我国历史沿革和国家制度的科层管理方式逐渐优化,使之从“命令-服从”的一元化管理结构向“协商-对话”的多元治理结构转变。在功能性分权模式下,各部门各司其职,尊重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良好互动与协调整合,将有利于构建大学内部权力规范协调机制,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促进公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发挥效能。

权力规范协调机制能够形成大学内部治理“一盘棋”局面,致力于实现大学公共利益,修正偏离根本任务的满足私利的行为,真正做到“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高效工作模式。与此同时,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群体在整体性治理结构中应享有“治学”主导权,能够发挥学术人员在追求学术真理、维护学术自由和制定学术标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学者之间不因学科的分化而无序地争夺资源。学者们一致认同的目标价值应是突破单一学科的桎梏,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嵌入个体学术生涯,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协调学术权力关系,消除对峙、冲突的情绪,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互相协调、共享资源、共创成果。基于整体性治理,大学内部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制度优势,构建“学术-行政”合作共赢的整体性内部权力协调机制。

(四)整体性治理强调发挥技术革新优势,主张整合“用户”需求,建立信任关

系

发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技术优势已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途径。从信息资源的口耳相传到电磁波的远程传输再到互联网的即时共享，技术迭代对治理变革展现出了惊人的驱动力和辅助作用。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大学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也会受到深刻影响。在教育教学领域，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单向传递，向“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共同建构转变，倒逼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在科学研究领域，利用智能化技术手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打破或弱化传统的院、系、所之间的学科分隔或知识藩篱。在行政管理领域，围绕大学组织的共同目标，突出行政事务的辅助支撑和服务保障作用，能够提高日常管理的效率、质量和水平，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的实现奠定基础并提供保障。

整体性治理所采取的技术手段，有助于整合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改变过去以行政组织需求、职能机构需求为导向的数据信息利用思维。“增加公共部门运行的透明度和回应性，实行一站式服务，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事务采取跨越边界的协调和整合”，能够为构建高效服务保障体系的合法性和公众信任度奠定基础。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既要建设共同的价值观，也要在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上促进主体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还要通过高效便捷的外化形式为其提供支持保障。因此，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坚持需求导向，将与利益相关者的学习工作生活的数据信息进行优先整合，掌握大量数据，了解合理诉求，开展即时、高效的数据信息服务供给，释放“信息红利”。在整体性治理理念指导下，打造智能共享平台，实现数据标准的统一性和匹配识别的准确性，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最大化、可信赖的便捷服务。

四、实现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的主要策略

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可从体制机制建构和制度安排运行等方面，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完善教育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运行效率，实现行政模式与人本化特征的结合与转变，发挥新兴智能技术的变革创新优势。

（一）价值共建：突出整体利益达致共同目标

公立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的核心目标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现代化的大学内部治理理念，摒弃传统管理的集权思维和市场化过度竞争，树立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共赢体现大学公共价值、公共属性特点的现代化治理理念。基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共建，强调保持大学内部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侧重于做增量发展。实现价值共建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一是各治理参与主体要具备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围绕立德树人目标展开行动，破除自利思想下的分歧和争端；二是强调各治理参与主体的一致行动，在目标融合的前提下采取治理行动；三是强化公共价值的约束性，促使利益相关者以实现大学公共利益为先导，进行价值理念塑造。

需要明确的是，价值共建并非消除差异性，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主体思想和行动的有机统一。价值共建的过程就是各方共同努力寻找新的平衡点，而平衡点的实现指向大学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当内部沟通成本急剧上升时，组织形式的选择会严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促使组织内部的组成部分寻求外部交易；利益分化会加剧对组织的破坏，直到形成新的平衡。价值共建的目的就是将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的价值理念进行整合，充分认识两个体系的

对峙只会带来两者之间的利益分化，而现实生活中由于两者在不同院校、不同时期主导地位此消彼长的形态，又不可能制造一种“完美无缺”的划分限度，所以在达成价值共识的过程中，要尊重治理主体的差异性，做到“求同存异”，争取“求同化异”，在共同的价值指引和目标引导下，促进学校公共事务有序运行。

（二）制度联合：形成“刚柔并济”的制度约束

由于在复杂组织中，多元主体博弈需要制度化的规则体现资源安排和利益分配的最终结果。在整体主义制度者看来，制度是组织，并视制度为一种行动的角色，并不是直接约束、规制参与者行动的规范或规则，而它自身已成为行动角色。之所以追求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是因为大学整体大于其内部各部分之和，学校的整体影响着和制约着包括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中的个体。无论学术人员还是行政人员、学术部门还是行政部门，其在大学组织内部的行为都需要通过大学这个有机体来对外解释，个体只有融入到大学整体，才能在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深刻内涵中发挥作用、展现意义。

大学的制度规约是在理性选择下通过各种正式规则、指令，采取程序化方式由权威机构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制度安排。大学的组织文化是在复杂系统内部自下而上产生的柔性规范，由人文经验演化出组织规则、习俗惯例和文化认知等等，已被利益相关者内化于个体观念或组织行为之中。这种人文规范是经过筛选的、能够依靠自律方式实施，可以免于强制力执行的行为反馈。人们常说，思想建设是组织发展的前提，制度建设是组织治理的基础，因此，大学组织实现制度联合，便是在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和共同文化认知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最优组合。成熟的组织一般是通过建立强制性和诱致性的规范体系来平衡和协调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避免冲突。构建整体性的内部治理结构要发挥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联合互补作用，进而提高制度的效率和效度，因此，严明的制度规范和良好的组织文化，是建设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制度体系的有效路径。在建立“刚柔并济”“软硬结合”的规范之后，便可得到制度安排的普遍合理性和普遍正义性。整体性的治理实践中，既要有“规约框架”，又要有“意义框架”，以此来引导利益相关者开展目标高度一致的治理行动。

（三）智能共享：整合信息资源打造交互平台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信技术正在进入人们生活，逐渐成为影响治理效能的保障性因素。这种转变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在于技术手段作为“物”的工具属性，还更突出了重视“人”的互动价值属性。未来的智能信息共享系统，是突出便捷性、舒适度、操作感，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理念。因此，公立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所建立的智能共享信息辅助系统就需要整合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改变以往以行政需求、职能需要为导向的信息开发、存储、使用的思维定式，释放数据资源的丰富价值，改变大学内部数据管理工作仍以信息化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局面，发挥教师、学生作为数据生产方、数据使用者的主体作用。为此，首先，要树立共享意识，把个别行政管理人员存储的海量数据由“私人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在智能系统的支持下发挥共享价值。其次，要围绕数据为人服务的原则，打破部门主义造成的“数据壁垒”，调动大学内部数据信息生产主体的共享意愿，消除“信息孤岛”，降低治理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解决各系统的兼容性、统一性问题，寻求

数据治理的标准化、系统化。再次，要促使各业务单元、校院之间形成统一的数据采集、存储、共享标准，即便是由不同主体搭建的各自封闭的信息系统，也要在标准化的底层数据架构基础上，使存储于各个平台系统中的数据能够被智能系统识别、整合并加以利用。实现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目标，唯有“会用数据”才能“用好数据”，发挥数字资源的治理效能，助力大学内部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育人研究

文 / 林冬冬 徐硕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在“管理服务体系”部分中明确提到要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将园区打造成为集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园地。2021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发布《关于深化“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一站式”学生社区的育人目标和育人功能，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化“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改革。在此背景下，深入研讨“一站式”学生社区的育人功能及发挥，对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历史考察

学生社区拥有生活和管理的双重属性，既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也是高校进行教育管理的基础单元。高校学生社区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更是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参考苏联模式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多人住在同一间宿舍，实行封闭化管理。当时的高等教育管理者更加注重学生在第一课堂日常教学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引导，学生社区的管理仅依赖于宿管人员。因此，学生社区在这一时期只具备住宿功能，育人功能尚不明显。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是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学生住宿环境日渐改善。学生日常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的新需求开始浮现。199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德育工

作要与关心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相结合与加强管理相结合。学生社区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德育教育平台的功能逐步显现。进入新世纪,《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继发布,强调完善辅导员、宿舍和公寓管理人员、学生党员和骨干密切配合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体系,明确高校学生社区育人队伍构成,进一步推动学生社区育人功能彰显。2004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发挥学生社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07年,刘云山在第十五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探索党的工作进学生社区的有效机制。之后,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改革及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社区在育人领域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凸显,“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应运而生。新时代以来,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要求积极推动高校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明确“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具体路径。2021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在工作要点中提出全面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改革,指导高校打造党委领导、学工牵头、教师协同、学生参与、支部引领、社团助力、辅导员入驻的学生党建前沿阵地、“三全育人”实践园地、平安校园样板高地。2022年,教育部在发布的工作要点中再次强调要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实现对1000余所的高校有效覆盖。多所高校积极响应《关于深化“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等重要文件要求,先后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特色亮点,不断挖掘和优化学生社区的育人功能,发挥学生社区的感染作用,联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整体而言,“一站式”学生社区在此阶段覆盖广泛、成效显著,逐渐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典型经验。

二、“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所面临的育人困境

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问题意识。要促进新时代“一站式”学生社区内涵式发展,推动其综合管理模式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学生社区育人功能,势需系统检视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和挑战。

1. **育人力量下沉不够。**“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入住学生社区的楼栋辅导员,主要负责该社区范围内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文化建设等工作;另一类是后勤管理保障人员,主要负责学生宿舍园区的物业管理与安全管理等基础事务。高校后勤管理保障人员受到本职工作和自身素质的限制,在管理服务工作中缺乏育人意识、育人效果甚微。面对学生社区庞大的学生数量和复杂的构成情况,辅导员这单支育人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在“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应存在一支由各部门相关负责人员组成的隐形育人队伍。但当前下沉学生社区的管理人员尚未形成对学生社区育人的认同感,大多只关注自身业务。辅导员队伍与管理人员队伍之间存在育人壁垒,未能形成育人合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管理育人成效。

2. **模式悬空落地落实不够。**当前,“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院校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书院制为基础助力综合管理模式,制定完整的“工作责任清单”和

“单位责任清单”，依托党团队伍建设、导师队伍建设、管理人员建设实现领导力量、管理力量、思政力量、服务力量的下沉。另一种是以宿舍园区为依托的学生社区建设模式，通过在宿舍园区建立功能型党支部，加强宿舍园区党建引领，深化基层党组织的资源优势。以党支部为抓手开展育人工作，让学校领导班子带头深入宿舍园区、辅导员常态化驻扎宿舍园区、干部担任兼职辅导员融入宿舍园区。上述两种模式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真正关注到学生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导致“一站式”学生社区落地落实不够，学生群体对其管理参与度低、认同感差、获得感少。

3. 育人抓手较为单一。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过程中，党建引领是学生社区发挥育人功能的关键路径。但就实际操作而言，“一站式”学生社区往往是以既有学生党支部以及部分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功能性党支部为抓手，通过党支部建设开展组织育人工作。工作中往往局限于党团活动、文化建设等，忽略了专业教育的参与、思政力量的支持、榜样力量的引导。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理想状态是各环节的管理力量与育人力量下沉到位，实现全链条育人，原有思政力量仍是“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在现有“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建设中，专业教师的参与度低，对社区所属学生专业知识基础夯实、专业学习能力提升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此外，马克思主义学院等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见长的学院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存在感低，未能有效促进浸入式教育，切实提升思政育人工作实效。先进榜样的示范作用也未能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过程中凸显，未能营造出“亦师亦长”的成长氛围，削弱了学生社区的育人成效。

4. 育人理念创新发展不够。在目前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过程中，线下育人仍然是主要手段，网络信息技术这一关键性因素未得到应有重视。相对滞后的育人理念导致互联网技术未能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中发挥增量作用。各试点高校仅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网络技术来满足学生足不出户办理各项事务等浅层次的服务需求，而针对作为“网络原住民”的新时代大学生而言，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网络思政等深层次的网络育人功能尚未充分挖掘，信息化、智能化的大数据对解决学生关切，提升“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解决学生问题的及时性、前瞻性等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三、“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育人的优化路径

构建“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模式要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思政体系，以一流思政队伍培养一流人才，以专责思政为核心，以交叉融合为特色，以学生社区网格化管理为支撑，以学生事务管理流程再造为抓手，促进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成效提升。

1. 明确“关键点”凝聚社区育人力量。学校党委抓总，校党委书记、校长齐抓共管，明确成立“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制定《“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实施方案》，推进落实社区具体改革工作。践行“一线规则”，校领导、知名专家担任书院院长，且校领导担任社区楼宇长，深入学生社区联系学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部处（院系）领导担任楼长、层长，通过面对面或者线上谈心、举办讲座、参加社区学生活动等方式深入学生社区，增进相互了解；全校辅导员、宿管全部入驻社区开展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到精准服务；聘请学业导师、成长导师、朋辈导师、校

友导师等各类导师，明确导师工作职责、分工细则，实现学生教育活动全覆盖。

2. 把握“着力点”探索社区育人工作新模式。以书院建设为基础，进行宿舍公共空间改造升级构建集思想引领、文化浸润、师生互动、活动开展、情谊培养于一身的新型朋辈引领阵地。构建“四自”教育模式，引导学生融入社区建设，激发自身成长内在动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融入课堂，开展各类评选，如“学霸笔记”等，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推动自我管理升级，通过书院学生会、社区学生自治管理委员会、书院青协等学生自治力量服务社区。激发自觉成长动力，推进校企合作，助力创新创业，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3. 找准“切入点”贯穿社区治理新理念。与专业教工党支部围绕学科专业辅导、科研能力训练、创新创业培训等方面进行结对共建；围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社会服务、相关专项任务等实际工作需要，成立师生联合党支部；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动，建设“思政名师工作室”，加强党建阵地建设；设立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的功能型试点党支部，学生会（研究生会）功能型党支部，激发社区党建活力；成立党建领航站，聘请党政领导、烈士遗属、抗战老兵代表、行业突出贡献专家、青年党员教师代表等开展专题党课，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引导大学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4. 寻到“突破点”拓展社区功能。构建网上思政引领，线上线下相结合，书记、校长带头，马院教师、思政专家进驻社区讲思政课。通过“精准定位”“精准定法”“精准定制”，聚焦学生大数据画像，三个路径推进网络思政精准配送，进行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着力学生工作的“流程优化”与“流程再造”，树立“信息化、精细化、个性化、系统化”工作理念，建立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打造心理咨询、资助管理、日常生活、学习指导、学生事务、就业创业服务等涵盖多项业务，配备自动打印终端，扎实推进让学生“最多跑一次”改革，切实提升学生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成立一支24小时全覆盖的线上线下舆情言论、心理危机识别队伍，实现第一时间了解、第一时间干预、第一时间解决，及时全面了解学生诉求，探索社区版“枫桥经验”。

5. 培育“创新点”完善社区育人新路径。深度融合“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跨学科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发挥学科特色，结合专业特点举办相关活动，建设学院文化阵地，邀请专家学者开展“每周科研”“学者午餐会”，搭建学生社区“体验+实训+落地”创新创业实践平台，“3+3”学生社区跨学科创新创业模式。将心理和就业辅导站引入社区，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定期开展宿舍之星评选、社区文化节、大腕下午茶、庭院音乐会等特色文化活动。打造“一院一品”育人矩阵和一批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的“辅导员名师工作室”。

（摘自《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1期）

“知乎治校”现象分析及其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启示

文 / 徐喜春

“知乎治校”是指以大学生为主的群体将意见与诉求等诉诸知乎平台，试图借助舆论力量倒逼学校调整决策与改善管理的一种现象。“知乎治校”现象既是知乎平台“匿名性”、“扁平化”、“弥散化”等交往逻辑的直接体现，又反映出大学生表达意见与诉求的热切渴望。大学生在知乎平台上“问话”学校，折射出学生蓬勃发展的权利意识与学校民主治理技术手段、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权利需求。”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高度肯定了“权利”是“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明确提出“满足权利需求”的方向与任务，为高校构建满足大学生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需求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高校不断为大学生权利实现夯实法治基础，构建以民主参与和有效监督为基本运行机制的治理体系是依法治校的基本要求。

一、“知乎治校”现象中的权利关系分析

“知乎治校”现象的发生与演化源于权力、权利、媒介等因子之间的博弈和衍生。互联网技术拓展了“权力—权利”的对话场域，在现实与虚拟交织的双重叙事场域中开拓出新型的“问话”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内隐的价值诉求转化为外在的言语行为，从法理角度而言，就是个体从接受内心道德约束调整为接受法律规制的过程。知乎平台极大地改变了学生表达自由权利的实现方式，扩充了大学生话语表达的平台与渠道，但匿名化的信息传播逻辑也容易导致权利的迷失。部分大学生在知乎平台上妄加揣测、造谣生事、抹黑诋毁，看似是自由表达权利的声张与实践，却实质性地侵害了他人的权利与自由。为此，必须厘清“知乎治校”现象中内在的权利关系图景，为大学生的“知乎问校”提供合法有序的行动框架。

（一）从程序权利上看，“知乎治校”现象是表达自由权利的延伸

“知乎治校”现象从宪法学意义上看，是大学生表达自由权利的派生形式，即借助知乎平台表明立场、态度与观点。宪法赋予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保护公民合法自由地接受与传播信息。“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各类言论表达的主要场域，开辟了言论自由的新渠道。”知乎平台作为匿名化的“问答平台”，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的表达欲，为他们行使和实现言论表达权利提供了便捷化的渠道。大学生利用知乎平台反映意见、表达诉求与建言献策，以“我”的视角在知乎平台上分享见闻、发表见解、讨论校园决策甚至进行情绪宣泄，成为表达自由权利的生动实践。一方面，“知乎治校”现象反映出大学生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实践。大学生在知乎平台上“问话”学校，既是他们充分展现自我关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立场与思想的过程，又是互联网时代言论表达的崭新表现方式。大学生利用知乎平台进行批评、建议或监督，实质是以“我”作为学校成员的主人翁立场，阐明对学校行为的观点与态度。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大学生体验的不仅是“我”与学校之间的深度联结，而且确证了自身作为

自由表达权利主体的地位。另一方面,“知乎问话”是大学生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和争取。大学生借助知乎平台“问话”学校,事实上也是基于自我的认知与价值立场向学校主张权利。近年来,“食堂卫生”、“张榜公开违纪处分”等话题频频成为知乎热点,折射出大学生对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权利的关注和重视。他们以“问话”的方式向学校声明自我对权利的认知和争取,力图监督与制止因学校行为的“随意性”而造成对“我”权利的侵害。

(二) 从实体权利上看,“知乎治校”现象的实质是“权力—权利”的互动

大学生意图以舆论施压的方式倒逼学校调整政策和改进管理方式,从根本上说,是学生权利对学校权力的质询与监督。《教育法》赋予了高校自主管理权,保证其能够基于发展需要与教育任务自主地组织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活动。高校管理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表现出权力的基本属性。大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既享有法律赋予一般公民的法定权利,又享有作为受教育者特定的专属性权利。大学生的一般性权利以及特殊性权利置于学校教育管理场域之中,表现为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隐私权、申诉权等权利内容。“知乎治校”现象从本质上看,是大学生以权利的名义对学校具体管理行为提出“质询”。

“知乎治校”现象所涉及的话题大多采用“如何看待××学校……”、“如何评价××学校要求必须……”等表述范式,从这些表述范式中能够明显觉察到大学生对学校管理行为的质疑和质询。威廉·冯·洪堡特指出,“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即话语背后蕴藏着语言者的立场、态度与情绪。大学生“问话”学校的话题与叙事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积极利用知乎平台表达意见与寻求共识的心态,而且提出了他们对学校相关决策行为合法性、合理性和合程序性的质疑。当高校管理决策与大学生的意见诉求相冲突,而且大学生又未能有效参与其中时,部分学生就可能认为自身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大学生借助知乎平台反映意见诉求的行为看似是聚焦具体化的管理行为,但深层次折射的是对学校管理权力的质询。“知乎治校”现象提出了在法治观念不断发展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治理如何转型发展的问題,即学校在行使其管理权时,如何有效保障好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实现“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

(三) 从实践视角上看,“知乎治校”现象中存在权利僭越行为

大学生积极行使表达权利,充分彰显了“法治”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但是由于知乎平台的匿名性、弥散性与便捷性等运行逻辑,也产生了大量的权利僭越现象。“网络表达属于虚拟社会中人们进行的言论交往,其所表达出来的内容实质,主要体现着一种人们自认为其不可剥夺的排斥他人强制的内在自由。”大学生网络表达这一行为,内在包含着不逾越边界、不侵害他人权利等要义,即学生在知乎平台上主张自我权利时应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避免侵害他人权利。反观“知乎治校”现象,大学生不是利用学校设立的反映渠道传递声音、表达诉求或者交流思想,而是以表达自由、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学校权力等名义向学校施压,这种方式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为侵权行为。首先,“知乎治校”现象在主体维度上表现出强烈的匿名性与广泛性。知乎平台自推出以来,因其匿名性的特点受到大学生的广泛青睐。匿名化发帖的功能虽然有助于大学生全面真实地展示意见和诉求,但也造成了因为主体不确定而导致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得以传播蔓延的现象,其中不乏大量侵害他人权利的信息。部分学生在知

乎平台上肆意曝光相关主体的隐私信息，甚至采取谩骂攻击的方式，严重超越了表达自由的权利边界，造成了对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的侵害。其次，“知乎治校”现象在过程维度上表现出冲突性与对抗性。大学生利用知乎平台“问话”学校，不是基于理性平和的对话立场，而更多是宣泄不满情绪，将“志同道合者”集结起来成为“反对的群体”。“反对的群体”一旦集合起来，就会陷入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经典著作《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非理性状态，出现对学校贬低、侮辱、攻击等不理性行为。再次，在结果维度上，“知乎治校”现象带来的后果表现出妥协性与无奈性。“知乎治校”现象的确为学校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外在监督，但是也容易导致学校正当的管理权得不到合理行使。学校自主进行决策和管理，这既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又是学校的正当权力，但“知乎治校”现象可能造成学校因为学生的曲解而不得不调整或者放弃原本科学合理的决策。“知乎治校”现象不是以法治化的方式表达意见，实际产生的后果也不是基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而是学校基于维护形象和校园稳定等因素被迫作出让步。从这点来看，“知乎治校”现象并没有为“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提供法治化的因应之道，反而造成了权利僭越现象。

二、“知乎治校”现象发生根源的法理审视

“知乎治校”现象反映了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在价值取向上的相互背离，反映出“命令—服从”的管理模式正面临着学生权利意识觉醒的挑战。“知乎治校”现象的出现既是知乎平台匿名性与精准性等技术手段推波助澜的结果，又透露出学校与学生之间良好互动机制的缺失，但深层次折射的是大学生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与学校管理权之间的冲突。面对屡见不鲜的大学生舆论施压行为，必须洞察其背后的价值逻辑与法理关系。只有认真反思“知乎治校”现象发生的根源，才能构建“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格局，既理解大学生“隔空喊话”行为背后的权利诉求，又防范以高压舆论态势“污名化”学校管理权的正当行使。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关于法律关系的认知存在价值张力

高校与学生之间关于法律关系认知的价值张力，是指在教育管理的互动实践中，由于高校与学生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知存在价值分歧而导致的紧张无序状态。“知乎治校”现象的发生根源于“特别权力关系”与学生权利本位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高校自治权深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即高校在一定范围内，对大学生享有概括性命令的权力，而学生具有高度服从的法律义务。从这个角度而言，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命令—服从”的隶属性法律关系。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高校与学生更多是处于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状态，两者之间“命令—服从”的关系属性尤其鲜明。高校自治所拥有的对大学生概括性命令的强制权力，容易导致它以隶属的价值思维认知学生群体与学生权利，而这与日益觉醒的大学生权利意识出现了明显的背离。

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国际权利泛化思潮的影响，大学生权利本位的思想不断强化。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不同，权利本位思想秉持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国家权利之间的平等性，强调权利优位于义务。权利本位思想将大学生视为独立平等的法律主体，认为学生天然具有与学校平等对话的法律地位。基于此，大学生不断争取在学校管理中的话语权，力求以平等对话者的身份资格表达对学校事务的见解。两种差异化的价值认知不断博弈，演化

出高校和学生关系的多元化样态。置于高校教育管理场域之中,“学校管理权—学生权利”之间的地位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导致学生与学校“平等对话式”的互动模式面临着许多困难。面对平等对话诉求中遭遇的障碍,大学生选择依靠知乎平台“隔空喊话”以施压学校。他们钟爱于知乎平台外在于学校管理框架的优势,力求通过知乎平台寻求共识和扩大话语力量,以获得与高校平齐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依靠舆论力量突破了服从性的地位状态,赢得了与学校平等对话的机会,迫使学校不得不认真考虑学生的意见诉求,进而调整管理行为。

(二) “权力—权利”的双向互动面临着制度张力

大学生试图利用知乎平台影响力形成舆论浪潮压制学校,反映的是在高校内部“学校—学生”互动的失衡,而尝试引入外部力量制约学校。“在‘教育善治’的语境下,学生不仅需要发声的渠道,更需要参与学校事务的有效平台,以达到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利之间的平衡。”当前,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双向动态沟通缺乏充分明确的制度指引。一方面,“赋权”与“赋能”失衡。法律赋予大学生享有一般公民的普遍性权利和受教育者的专属性权利,为大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对话、互动提供了法理依据。法律肯定了大学生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等权利,但是对于他们如何以学生主体身份实现和表达这些权利的论述却相对欠缺。在规章制度层面未能明确大学生权利实现的渠道与方式,制约着权利的深层次实现。当大学生在出现与学校决策不同见解之时,就只能借助知乎平台“发声”等方式向学校表达其情绪态度与立场观点,而这无形中破坏了学校的形象声誉与校园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高校与学生之间“权利—义务”的法治框架不够明确。“学校教育管理权是一种特别的公权力,是学校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学校高度的自治权不仅能够促使其保持好与政府、社会等主体间的适度关系,而且有助于学校根据人才培养规律不断调适与优化教育教学实践,但也容易导致高校权力的过度膨胀。高校担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学业指导、就业服务等多重职责,与大学生之间建立起密集复杂的法律联系,这些法律关系体现出明确的相对性,即以大学生的行为作为最主要的权力客体。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设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框架。但当前法律规制对于高校与学生如何良性互动以及学生如何有序参与学校治理的规定却相对缺乏。大学生在自认为权利不能得以充分尊重和实现的情形下,借助知乎平台力求寻找他人共鸣以凝聚迫使学校让步力量的做法,启示必须尽早建立学校与学生以“权利—义务”互动模式为核心的体制机制。

(三) 学校治理中学生参与权的实现存在实践张力

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各高校不断建章立制,重视发挥大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性,探索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与方式。《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条提出“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为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供了方向性的保障。为更好落实学生的参与权,高校探索形成诸如“座谈会”、“提案大赛”、“学生听证会”等做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期待与需要,但整体而言,关于学生如何向学校表达意见诉求与声张自我权利的实践机制仍需细化完善。

目前,高校创设的学生参与渠道与大学生意见表达偏好之间存在脱节。知乎平台之所以受

到大学生的热捧，是因为其匿名信息传播的交往逻辑强化了大学生的安全感与信任感。大学生在平台上真实地表达对学校事务的看法和见解，不需要担心可能由此带来的惩戒后果。因为在高校教育管理这一场域中，学生的权利地位与学校并不完全相等，更多处于弱势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学生在面对学校所提供的表达渠道时，就会产生遭受打击报复的心理负担，降低他们表达真实意愿的动力。另外，当前高校所创设的参与渠道与机会表现出暂时性与临时性的特点。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内容可区分为程序参与与实体参与。“程序参与包括知情、申诉、抗辩等，实体参与包括立法事务参与（制定规章制度）、行政事务参与（各种行政事项）、学术事务参与（教学管理等）、司法实务参与（学生处分监督、申诉等）。”无论何种参与，都需要充分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实践经历、专业优势等，但当前的学生参与在参与对象上更多集中于学生骨干等群体，在参与形式上主要以临时性座谈会为主。这种做法未能充分考虑所讨论事项与参与学生的精准匹配性，不仅弱化了参与过程的科学性，而且在事实层面也剥夺了其他同学的知情权与表达权。学校话题之所以能够甚嚣于知乎平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算法技术的精准推荐。知乎平台结合用户的使用习惯与浏览偏好等特点个性化推荐相关话题。如此一来，大学生对所接触到的相关话题就表现出熟悉性与兴趣性，能够针对性地发表意见。

三、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实现路径

“知乎治校”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大学生表达自由权利的内容范畴与实现方式，但也容易催生“以言代法”、“挟舆论以令学校”等问题。这种做法不仅可能侵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而且容易造成师生之间的对立冲突。“知乎治校”作为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的极端化形式，折射出“学校—学生”良性互动机制的相对缺失，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学校主动赋权与学生有序参与的治理体系。“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不仅是对学生主体地位及主体权利的进一步认同和肯定，更是实现学生民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高校与学生要确立“治理共同体”的理念，形成制度性的协商沟通渠道，实现彼此间目标的平衡与融合。

（一）确立高校与学生“治理共同体”的理念

无论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将学生置于隶属性与服从性地位，或者是“学生权利本位理论”强调学生权利的至高无上性，本质上都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对立起来。“知乎治校”现象企图利用网络舆情胁迫高校作出让步，这种对立化的关系思维不但无益于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的良性互动，而且衍生出一系列的权力滥用或权利冲突现象。高校与学生既是学校发展的受益者，又是学校发展的实践者与创造者，两者应构成治理实践中的“共同体”。“治理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双重意蕴：一是在本体论层面上，肯定学生在大学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大学教育的过程不应将学生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应将其视为积极的教育参与者，是当然的大学共同体成员。”基于“治理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学生与学校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平等性，享有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利。在治理进程中，学校必须充分尊重学生参与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体现他们作为利益直接相关者的地位。二是在实践论层面上，指向于培育学生公共理性的意识与能力。

“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设定不仅要求高校充分认识自身的“有限理性”，发挥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优势与潜能，而且要求超越狭隘的私人理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学校事务。引导大学生参与学校治理，更重要的目标还在于探索“理性行动”的责任意识培育机制，发展学生的担当

意识、协商意识和法治意识。

（二）构建以“权利—义务”为遵循的治理框架

从“知乎治校”现象的全过程看，大学生质疑的是学校“命令—服从”的实践模式，并依靠舆论态势倒逼学校作出让步，这种表达诉求的方式是“权力”路径，而并非“权利”路径。这种用群体力量对抗学校管理权力的方式无益于“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还会直接影响学校治理格局的深度实现。防范高校与学生的对立冲突，不仅要求高校剔除绝对权威的思维定势，而且需要构建高校与学生“权利—义务”的行动框架，形成学校与学生共商、共治的“善治”格局。“‘良法’是‘善治’的基础和前提，对于高校而言，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是推进依法治校的抓手和载体。”为此，要在相关立法中细化大学生参与权的具体内容，对大学生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附属性权利进行立法明确，并对其内容、范围、限度和保障措施等作出操作性规定。比如，高校同时承担着知识生产、人才培养、职业训练等多样化职能，若不加区分地鼓励学生广泛参与学校管理，将直接扰乱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结合大学生在校期间以学习作为中心任务的定位，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参与特定事务的专业性能力等方面的考虑，学生可以重点参与大学章程制定、学生评优惩戒、课程设置与评价、后勤服务管理等事项。在程序实施上，可以要求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出台必须经过听证程序，在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等涉及学生权利的集体议事决策机构中，明确规定学生代表的比例。大学生参与到学校决策之中，不仅能够增强他们关于学校治理实践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且能够发挥朋辈效应，向周围同学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有效减少知乎平台“问话”学校的情况。同时，相关立法还应该提出大学生参与的权利边界，避免参与权的滥用。

（三）打造以协商对话为基础的“善治”格局

按照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赫伯特·A·西蒙“有限理性”的观点，任何组织决策都是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的过程。这就需要高校将“治理共同体”理念与“权利—义务”治理框架转化为具体化的实践机制，建设主体多元、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大学治理体系。一方面，开发多元化的校内意见表达渠道。大学生倾向于选择知乎平台发表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乎平台所提供的匿名通道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学生发言的风险。针对当前意见反馈渠道大多采用实名制的现状，高校可以从优化学生表达和参与路径的思路出发，适度开通匿名化的意见反映渠道。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打消学生担心受到追责或者报复的心理，为学生更广泛地表达意见提供途径，而且能够为学校提供掌握学生思想动态的线索。当然，匿名化的意见反馈渠道要坚持专人跟进、保护隐私等原则。另一方面，建立“信息收集—意见座谈—意见反馈”的链条式机制。细化《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依据这一规定构建校内事务公开、监督和反馈的一体化机制，并提出结合不同学生专业、特长、爱好的精准化参与机制。如此，引导学生向学校反映意见和参与学校管理就能更好地避免盲目性与随意性，剔除可能存在的“形式参与”等问题，从程序参与和实体参与等方面充分保障学生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知乎治校”现象启示高校与学生要避免陷入“对抗式”的互动逻辑，而以“治理共同体”的立场与态度共建、共商学校事务。大学生积极与高校管理者对话，既有利于满足他们的权利诉求，又是高校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现实要求。大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与学

校实现平等理性的交往对话，凸显了他们作为权利主体与学校成员等多重属性，但这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既需要有“良法可依”，不断完善“权力—权利”良性互动的规章制度，又需要“观念建构”，提升大学生理性参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2期）

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构建： 生成逻辑、功能界定与维度设计

文 / 张茂聪 窦新宇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交叉学科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交叉学科是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彼此渗透、相互交叉而成的新学科。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交叉学科不可避免地出现，逐渐成为各门类知识和研究方法的集聚地。纵观科技创新历史，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AI+基因组编辑等大多产生于学科边界或学科交叉领域。目前，学界对交叉学科高度重视，积极建立相关研究中心或机构、确立相关制度和组织建制以助力交叉学科发展。2014年，美国联邦政府专门实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培训计划”，在学科融合领域重点培养STEM跨学科人才的研究能力。2018年，英国研究理事会、英国创新署和英格兰研究委员会共同组成了英国研究与创新部门，对跨学科、跨组织的研究计划提供科研资金的资助。我国也十分关注交叉学科发展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如此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先进科技突破和前沿尖端科技成果与交叉学科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交叉学科产生于学科交叉之处，生成于不断进步的社会发展需求中，为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应“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为此，我国应大力支持和鼓励交叉学科的发展，明确交叉学科在我国国家战略发展和教育事业中的关键作用，推动交叉学科向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和优势学科迈进。事实上，我国早已将交叉学科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中。2018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和交叉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交叉学科成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重要载体，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高校的交叉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相关制度障碍。

我国高校中运行着以行政权力为主导、以传统学科组织架构为实施对象的学科制度。交叉学科是知识跨学科流动形成的新兴学科，其知识增长是对传统学科的继承和突破，发展机制灵活，无论是运行方式、研究模式还是学科性质都与传统学科存在质的差异，在原有的学科制度框架下难以与其相适应和协调。美国研究生委员会也指出，由单一学科构成的体制结构不利于交叉学科的组织优化和资源整合，当交叉学科项目影响到原基础学科教师利益时，教师会变成学科利益的捍卫者，拒绝对交叉学科项目提供帮助，项目会陷入“看不见的裂缝中”。在当今社会迫切需要高水平交叉学科创新人才与技术的情况下，交叉学科的学科制度与组织建制成为其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痛点与薄弱点。构建独特、适切的管理制度体系在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

目前交叉学科研究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其管理制度运行逻辑与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明确的理论构建与引导。以往对交叉学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交叉学科定义、合法性、分类、人才培养模式、学科组织结构、学科制度、个别交叉学科的发展模式等方面。已有对交叉学科制度的研究虽然较丰富，但大多集中于宏观的制度问题研究及问题解决的实施路径探讨，具体的制度框架构建与制度维度研究相对不足。杨朔斌认为，当今我国交叉学科的制度体系存在逻辑缺失、组织僵化和生态失衡的困境，应从体制、组织和环境三方面来推进交叉学科的制度建设。焦磊对国外高校交叉学科的组织建制进行介绍和探析，总结出国外高校跨学科建制的一般模式、机制与举措，为我国交叉学科的组织建制提供了借鉴。陈晋鹏等人对交叉学科的发展机制进行理论创新和模型构建，期望建立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良性机制。也有学者对交叉学科组织建制中的某一项制度进行深度探析，例如同行评审制度等，要求尽快推进交叉学科的学科评审工作，促进学科评估建设制度的发展。总体而言，交叉学科的制度研究基本停留在问题解决的路径探索或单一层面的制度建设上，缺乏对制度构建原则、制度内容制定、制度实施方法与要求等的整体性研究。

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复杂环境下多种因素集成影响的产物。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各个要素相互联结构成的有机体，其核心思想是秉持整体观念，对系统内各要素的存在、特点及规律进行全面揭示，通过系统哲学来探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缔结关系和结构特征，为顺应客观规律与优化结构功能提供证据”，找到系统运作的一般规律。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交叉学科的管理制度体系是对学科内部各要素进行管理和约束的有机整体。交叉学科管理制度

生成于学科、社会与高校发展的需要,包括学科文化、学科建设、学科结构等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推动着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形成、运行和演进。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生成于一定的构建逻辑,在特定的条件下生成,具备核心的内部要素和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具备要素、关系和结构的复杂巨系统,符合系统分析与层次解剖的基本条件”。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作为一种整体性制度,应使得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共同完善和发展,做到理念一致、运转协调。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论出发构建交叉学科的管理制度体系,即在明晰制度生成逻辑与具体内部功能的基础上以及整体观念的指导下,深度剖析制度体系中的各维度以及制度维度的组成要素,逐步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

对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展开研究,其制度的实施主体初步限定为我国高校中交叉学科、相关研究组织的治理主体,可以是若干院系,也可以是高校中某几个学科共同构建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或研究中心,甚至可以是某个单独运行、在高校中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研究组织。这些组织实施的学科管理制度,即为本研究中所指的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交叉学科管理制度并不是现成、推而广之、可以照搬采用的制度规则,也不是所有交叉学科都需要遵守的相同制度规范,而是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和章程式的制度维度体系。本研究试图对交叉学科管理制度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阐明制度体系构建的必要性,根据生成逻辑和制度设计起点进一步界定制度的功能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将适用于交叉学科、较为宏观的制度维度陈列出来,形成初步的制度框架和章程式的制度维度体系,为学科制度的设定提供初步参考。

二、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构建的生成逻辑

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天生具有差异性。交叉学科自产生之日起就缠绕在多方主体的运行逻辑中,受到多重逻辑的制约,其制度构建并非如传统学科一般遵循固定的生成和建构规律,而是具有鲜明的生成逻辑。交叉学科的产生源自学科和知识之间的交叉融合,遵循学科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科生长规律、社会发展需求和所在高校对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学科、社会和高校三个角度对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生成逻辑进行阐述,做出初步的探析。

首先是学科发展规律和知识生态演化的知识逻辑。学科知识的发展遵循科学的自然规律和学科的自组织性。交叉学科的产生不是学科的变异或变体,其出现符合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知识生态进阶的必然法则,是知识进化的最终样态。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与发展的历史性造就了分门而立的学科。在学科产生和发展初期,知识经过不断深化和提纯逐渐具备系统完整性,边界渐渐清晰,发展出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由此形成不同的学科,在学科之林中独树一帜。随着学科知识价值的提升和专业知识的不断扩充,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张,研究内容也随之丰富。这使得学科范围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触碰其他学科的边界,自然而然地与之相互作用,由此产生新学科。不同的知识研究样态和文化发展模式彰显新兴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间的差异。伴随着研究范式、语言体系和行为趋向的变革,新兴交叉学科与一般传统学科间的差异势必会造成学科研究及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和不同,交叉学科急需差异化的学科文化和组织建制,这是生发于学科知识进化的逻辑。

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问题解决的需求逻辑。近现代一些科技领先成果投入社会化应用后

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这些前沿科技大多产生于学科边缘和交界处,对社会发展、产业更新等社会需求的满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尖端科技纳米技术作为动态力学、量子生物学等学科交叉的产物,与计算机技术、核分析技术等先进技术结合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电子器件、空间探索、材料产业等方面,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越来越依靠交叉技术,其问题解决的逻辑和导向致使某些学科之间进行交叉。如应急管理学科的产生是基于社会重大问题解决的迫切需求,作为集管理学、社会学、工程技术学等学科于一身的交叉学科,在面对重大社会问题时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法。某些交叉学科往往与社会重大事件同频共振,应运而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促使学科建设不断推进、新兴科技成果不断产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推动社会问题得到良好解决,是生发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解决的需求逻辑。

最后是高校职能履行和价值发挥的应然逻辑。现今我国高校面临着学科划分过细、学院设置过多等困境,学科的高度专业化和不断细分在高校中形成一个个松散的“学术部落”,学科和院系间壁垒深厚,各学科之间较为分离,不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高校作为交叉学科的集聚地,更应按照相关办法的要求承担起学科建制的职能和责任,规范学科设置,构建科学合理的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与各项运转机制,大力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此外,随着学科间交叉融合和科学研究的深入,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人工智能、计算经济学等交叉学科产生诸多的应用价值,高校不可避免地与学科及相关外部组织产生直接联系。加之这些新兴交叉学科涉及多学科资源和背景,有些甚至要跨院系展开研究,对高校的研究单位形态造成冲击,传统的学科组织建制不再能助力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处于枢纽地带的高校应对新兴交叉学科进行合理布局,调整学科结构,理顺治理主体间关系,保障交叉学科的平稳发展,这是生发于高校职能履行和价值发挥的应然逻辑。

学科发展规律和知识生态演化的知识逻辑、社会经济发展及问题解决的需求逻辑、高校职能履行和价值发挥的应然逻辑都突出了构建差异化、系统化和组织化管理制度体系的必要性,交叉学科应具备一个系统完善、运转和谐的管理制度体系保障学科的快速的发展。

三、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功能界定

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在多方逻辑下生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体现出制度体系构建的各项功能和根本目标。对制度建设的关键内部功能进行探析,有助于概括和凝练制度建设的根本遵循和核心要点,对制度构建事项做出基本的质的规定,在维度设定时做到有所侧重,更好地构建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对于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其核心的功能目标大致包含以下几点。

(一)构建学科制度文化

管理制度体系应当构建科学适切的学科制度文化,培育良好的学术生态系统。学科制度文化潜伏在学科的方方面面,对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高校交叉学科面临学科制度文化构建的困境。每个学科都拥有自己的学科文化,在高校进行交叉学科建设,特别是创建交叉学科群或学术共同体时,是否根据学科特色文化进行区分后再聚合发展?对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审核时,是否能够摆脱传统学科发展规律的束缚,给予交叉学科

足够的时间、空间和关注？对于已经发展成熟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制度文化和院系治理规则是否可以推动学科快速发展？这些问题都发人深思。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科技工作中应“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构建契合的学科制度文化有利于营造学科内部的创新氛围，涵养优良学风，化解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之间的争端和矛盾，创建稳定平和的研究环境；有利于遇到学科建设难题时弘扬科学家精神，突破学科、院系的界限相互借鉴，化困难为机遇；有利于留住人才，保障、支持和推进学科的发展。构建特色鲜明的学科制度文化有利于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和谐稳定的学科环境，推动学科和高校的高质量发展。

（二）明确学科建设需求

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构建应当明确学科建设需求，聚焦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复杂性、综合性问题解决需求，设定科学可行的方向和目标，并根据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动态的变动和调整，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协同攻关，推动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和新兴科技成果的不断产出，进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并加速社会问题解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由此可以看出，科学研究应以国家急迫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长远需求为导向。因此，交叉学科的学科建设应寻求人才培育、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耦合。如波士顿大学的产品设计与制造工商管理是横跨产品设计和工商管理的交叉学科，其专业课程将工程流程加入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中，详细教导学生如何将客户的产品设计需求转化为工程规范，并将当代产品设计需求的预测考量及成果的效益转化纳入考核，将社会需求预测、产品升级换代与课程和学生教育相联结，促使学生将个人研究与社会效益、批量生产相联系，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构建完善的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能够考虑外部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明确学科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对外界需求做出回应。

（三）理顺治理主体关系

管理制度体系在学科结构方面应当理顺治理主体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科框架与结构。我国学科在高校内归属院系管理，交叉学科因其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常常需要跨学科、跨院系治理。因此，高校在设定制度框架和下设维度时应明晰学科所在院系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举措，对其内部学科跨度及源学科所在院系进行了解，明确规定所在院系的具体权限，进行责任的划归与判定，做到既能科学有效治理，又能激活学科研究平台的内在动力，保障学科充分发展。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文理学院作为本校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与化学学院、工学院等其余几所学院达成培养协议，同时开展主修和辅修课程，各院系分工协作、分别考核，进行跨学科教学与研究。除此之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推出跨学科领域研究，即依托研究项目内容建立学科交叉的学生自主研究空间，构建矩阵式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学生可自主申报加入相关跨学科研究机构，如基于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的合成生物学实验室、社会科学矩阵研究机构等，并取得相关研究成果，摆脱院系、学科等治理主体的阻隔与束缚。交叉学科教学、科研活动的计划与组织、教师的绩效评定与职位晋升等都需建立新的学科架构，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也需要适宜的学科组织作为发展基础。交叉学科的制度构建有助于理顺治理主体间关系，建立适切的学科

组织架构，为交叉学科发展保驾护航。

四、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制度维度构建

交叉学科的管理制度体系是保障学科各环节顺利运行的规则体系，是宏观统领性制度、中观内容性制度与微观一般性具体工作制度的有机结合。除了构建宏观制度的总体框架外，高校还应应对中观的制度内容维度进行把握，根据学科制度的核心功能对各项制度维度进行界定和构造，“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着重突出交叉学科特色，推动交叉学科快速发展。

(一)制度体系构建与维度推导的核心思路

本研究根据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生成逻辑和核心功能，从构建学科制度文化、明确学科建设需求、理顺治理主体关系三方面出发，以“构建学科制度文化，推动学科顺利运行；明确学科建设需求，确定建设基本要素；理顺治理主体关系，提供学科发展保障”为制度构建的根本原则和目标构建学科“运行、要素和保障”的核心制度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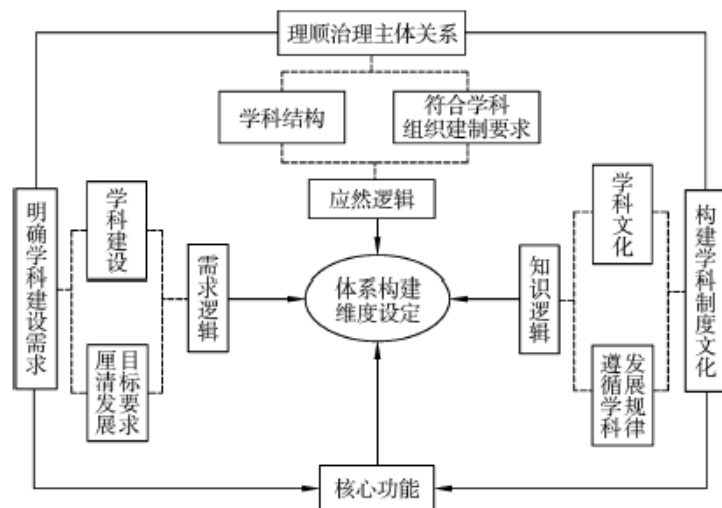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制度维度设定路径与逻辑推进关系

本研究中的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是一个相互支撑、互相协调的体系，既是不同层次制度体系结合而成的逻辑整体，也是由基础制度向外层扩散延伸、从宏观抽象到微观具象的相互关联的制度集。其制度逻辑贯穿整个学科，以章程式制度为基础，保障交叉学科功能和目标的实现。运行类制度、要素类制度和保障类制度是从制度的生成逻辑出发，为了实现制度的核心功能组成的关键制度维度。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生成于学科的知识逻辑、社会的需求逻辑和高校的应然逻辑，构建时须以构建学科制度文化、明确学科建设需求、理顺治理主体关系的核心功能为基本要旨，以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厘清发展目标要求、推动高校学科组织建制为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目标，推动交叉学科文化、学科建设、学科结构的发展。因此，运行类制度的设定应聚焦学科制度文化的构建，使交叉学科的发展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形成良好的学科文化；要素类制度的设定应明确学科建设需求，厘清交叉学科发展的目标要求，促进学科建设的大力发展；保障类制度的设定应理顺治理主体关系，使交叉学科的发展符合学科组织建制要求，规范学科结构的构建。不同高校、不同学科在制度构建时应着重突出学科特殊属性，考虑到人

才培育、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学科制度的创建要求,根据发展目标、自身情况等构建适合自身的制度框架和维度,方能促进学科的不断发 展。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中各要素的逻辑推进关系及制度设定路径如图1所示。

(二)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内容维度与核心组成要素

适宜的学科制度对知识进步和学科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交叉学科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建设迫切需要一个适切的、推动学科内涵式发展的管理制度体系。按照制度的生成逻辑和核心功能对交叉学科的各项事务进行考察并略加分类后,本研究将交叉学科的基本管理制度分为三类,分别为学科运行类制度、学科要素类制度和学科保障类制度;三个制度大类下初步选取能够实现各类制度根本目标、对其发展极为关键的十二项核心制度要素,建立起系统完备的章程制度体系。

1. 运行类制度。为构建适切的学科制度文化,我们需设定学科的运行类制度,确定学科运作的基本规范和流程,使其遵循学科发展规律,营造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推动学科文化的发展。从学科运行的宏观角度出发,高校应确立学科整体的管理制度和学科评估制度,对学科各项工作和事务进行具体规定,审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与举措,使交叉学科的发展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形成适切的学科制度文化。从学科运行的微观角度出发,高校应确立学科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师管理制度,对课程教学工作实施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进行规范和优化,创造良好的学科内部环境,减少发展阻碍,推动学科发展。运行类制度主要包含四项核心制度要素。一是学科管理制度,主要对交叉学科的各项日常事务和工作开展情况等进 行治理。交叉学科同传统一般学科存在质的差异,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容易引发学科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学科的顺利发展。因此,我们在治理时应设定学科的管理制度,突出学科差异,做出明确规定;对学科内的关键事务进行跟踪调查,对工作要务做出反馈及经验总结,在基本问题上做到有章可循,推动学科快速发展。二是学科评估制度。评估制度涉及交叉学科评估的主要过程和内容。交叉学科因其成果产出的长周期性、成果划归的复杂性等,学科评估难度大大高于传统学科。因此,我们在评估时应正视交叉学科研究容易遇到的困难,体察其与传统一般学科的差异,并将这些差异纳入评估考核的标准,制定合理的学科评估制度。同时,评估监察标准应覆盖交叉学科的各类人群及事务,对人才培育、知识生产、社会服务等各环节进行事无巨细的评估。如英国在2021年实施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建立了完善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从学科分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各方面进行详细的界定。除学科各项事务的评估外,高校也应对评估主体,即评估委员会进行元评估,保证评估过程的公正合理。对于差异较大、外行不甚熟悉的交叉学科,权威专家和学者更应对其评估主体、评估事项和评估的权责分配进行监察,以做出合理判断。评估过后各评估主体应及时公示结果,保证评估的公开透明性。三是教学管理制度。交叉学科的教学涉及多学科、跨学科,教学方法、模式和所需资源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应设定教学管理制度,对学科中基础课程体系开发、教材体系设定、教学质量监测与考核等各环节进行规定,制定并完善交叉学科的教学机制,推动学科教学的顺利展开。如日本东京大学的交叉信息学研究中心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单位,下设的研究生院为了保障学生更好地接受跨学科教育大力推行第二主修专业,要求学生将

参与其他系的相关课程作为对主体课程的补充。四是教师管理制度,主要涵盖交叉学科关于教师的一应事务。交叉学科涉及多个院系或学科,教师常常被跨学科调任或聘任,甚至在不同院系、学科进行升迁也是常有之事。如何对教师的跨学科流动进行规范?如何保障教师跨学科流动后的合理权益?要解决以上问题,进行妥善的安置和处理等显得十分重要。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1998年启动交叉学科教师的“集群聘任计划”,旨在打破现有学术部门的边界,通过竞争的方式使不同学科的教师进入交叉学科的研究集群,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活动。教师进入集群后即脱离院系管辖,由高校对其工作进行统一安排。此外,高校、研究中心等在聘任教师时应着重考察教师的专业背景和研究成果,以此判定其是否有能力进行跨学科任教;符合任教条件的青年教师应参加专业培训,以提升自身教学能力。

2. 要素类制度。为厘清学科发展的目标要求,推动学科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高校应确定对学科建设至关重要的发展要素,重点突破、着重发展。学科建设发展的基本任务包含两方面,即科学研究与课程教学。从科学研究的任务出发,对学科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要素主要为学术研究和导师指导;从课程教学的任务出发,对学科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要素为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对此“两类五项”核心因素进行制度设定,有利于对交叉学科的科学研究与课程教学做出基本规定,明确学科发展的基本目标,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满足学科建设的基本需求。一是基本学术制度,主要涉及交叉学科中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事务。基本学术制度对学科领域研究进步和学科建设水平提升起到重要作用,是交叉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交叉学科研究的跨学科性、长周期性和各学科资源的联结性等也都要求高校必须考虑学科间差异,建立符合学科实际情况、促进学科快速发展的学术制度。因此,基本学术制度应突出与传统学科学术研究的不同,如学术交流制度不仅要包括多学科的学术交流,还要包括校际、省际交叉学科群以及国内外交叉学科组织的合作交流;学科的研究成果应来自多个学科,且要合理分配学术成果;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不能照搬传统学科项目的申报原则和规律,应按照交叉学科的自身特点量身定制申报规则与时间期限。如浙江大学要求文科学科交叉预研专项项目的申报至少涉及两个学科,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文科一级学科;项目采用双负责人制,两个项目负责人须在不同的一级学科,其中至少有一位在文科学科,且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二是导师制度。对导师的相关聘任、分配工作做出制度规定,有利于交叉学科学生得到全方面的导师指导,促进交叉学科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根据研究方向和交叉的具体情况为学生配备不同学科背景的导师能够对学生进行多角度指导,培养学生综合思维;学生可参与不同方向的导师小组进行问题探讨和合作交流;不同学科开展的学术会议有利于促进学科间的知识互通,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如南开大学建立跨学院、跨学科的科研训练导师团,以跨学科的课题研究为指引,引导不同学科的导师团在课题研究中相互交流和探讨。跨学科导师制有利于培养学生交融互通的思维模式,养成跨学科思考的思维习惯。三是招生制度。交叉学科由于涉及多学科内容和知识,对招生标准进行设定有利于选拔多学科背景和高质量的生源,从根源上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如麻省理工学院在进行跨学科专业研究生招生时,会特别关注学生的学科背景并欢迎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加入,认为其能为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从源头上保证学科的交叉性。四是跨学科人才培养制度,主要涉及学科中的培养工作。人才培养是学科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推动学科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应划拨专项人员和经费,提供充足的知识和物质资源;关注学生的专业背景,加强跨学科思维与能力的培养。如浙江大学提出“理学+X”“信息+X”“文科+X”等七项“多学科交叉博士研究生培养专项计划”,利用学科门类齐全、学科结构层次丰富、研究平台聚集等学科生态多样化的优势,建立起极具高校特色和学科优势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利用自身的优势学科资源为学生提供探索学科交叉的空间。五是学位制度。交叉学科的学位授予决定了学科人才的培养目标、未来发展去向和就业归属,对学科发展和成果审核起到关键作用。高校对授予交叉学科毕业生的学位类别、学科归属和学位名称等应界定清晰,设定专门的规范,合理规划学科归属并仔细审核,避免含糊不清的问题。如麻省理工学院制定了跨学科的学位制度,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位均覆盖,规避了学位归属不清的尴尬局面;上海交通大学为交叉学科的博士生培养设立专门的博士学位点,并将其挂靠在与源学科基础理论相近的一级学科下进行成果的统计和归属,给予其自由发展的空间。

3. 保障类制度。为理顺治理主体间关系,规范学科组织建制,高校应建立学科的保障制度,使学科结构构建符合交叉学科组织建制的基本要求,保障学科平稳协调发展。构建学科的保障制度需关注以下环节。首先,在学科发展源头,高校应设定明确的资助制度,理顺交叉学科中的各资助主体与资源依赖关系,规范学科结构的构建,保障对学科的稳定资源供给。其次,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高校应设置交叉学科的激励制度,厘清源学科的成果与贡献,加强自身发展的认知,促进源学科协调发展。最后,在学科知识产出后,高校应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培养学科内研究者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组织各主体间关系的和谐建构。构建学科的保障类制度有利于为学科提供隐性屏障,使学科建设既能体现规定性的要求,又能为交叉和创新提供空间,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体现引领性和保障性。保障类制度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一是资助制度。交叉研究注重知识创新,与新兴科技的产生息息相关,加之科研成果的产生具有长周期性和不确定性,丰厚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必不可少。在交叉学科发展过程中,明确学科资助主体和资源依赖关系有助于为学科发展形成隐形的保障。如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交叉科研基金,对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群中的博士生培养进行资金支持和扶助。我国高校应建立健全交叉学科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和学科资助机制,考察学科发展状况,扶持资助相关研究,推动学科快速发展。二是激励制度。为交叉学科制定激励制度有助于明确各主体、源学科的贡献与过失,形成更加明确的自身认知,协调学科主体间关系,促进各主体平稳发展。激励制度旨在设定明确的赏罚标准。交叉学科内各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研究成果贡献应仔细划分,赏罚分明,以协调各学科主体间关系,保证源学科的稳定知识供给,促进交叉学科的平稳发展。具体而言,高校应对交叉学科的创新研究成果和突破性技术贡献授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混淆学术贡献者、成果侵占冒领者进行严厉处罚,建立档案进行专项记录。如斯坦福大学除了对教师进行学术水平考核外,还会考察其学术道德,对研究者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保护知识产权等进行评定,要求其不止在学术研究上有一定建树,还应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立交叉学科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对学科主体间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建立交叉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有利于在学科内形成互帮互助、思想健康、互相关怀的良好行为习惯,对学科各主体形成良好的相互关系、运行机制及学科的协同发展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保障学科实践工作的开

展，对学科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经理论构建与推导，本研究最终得出交叉学科的管理制度体系(详见表1)。

表 1 高校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

| 制度大类 | 核心制度要素 | 举例 |
|-------|-----------|---------------------------------|
| 运行类制度 | 学科管理制度 | 学科日常管理制度、事务跟踪调查制度、学科工作反馈制度等 |
| | 评估制度 | 评估标准设定系列制度、评估过程监察制度、评估结果公示制度等 |
| | 教学管理制度 | 跨学科教学管理制度、相关教学事务设定制度等 |
| | 教师管理制度 | 培训制度,教师跨院系聘任、调任及升迁制度,成果跨学科归属制度等 |
| 要素类制度 | 基本学术制度 | 知识生产相关制度、学术交流制度、学术成果分配制度等 |
| | 导师制度 | 研究生复合导师制度、多学科导师小组制度等 |
| | 招生制度 | 跨学科招生标准设定制度等 |
| | 跨学科人才培养制度 | 人才培养专项制度、跨学科人才培养考核制度等 |
| 保障类制度 | 学位制度 | 跨科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等 |
| | 资助制度 | 扶持保护制度、项目推进制度等 |
| | 激励制度 | 物质奖励制度、荣誉称号授予制度、处罚制度等 |
| |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人文关怀制度等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推动交叉学科的不断创新发展，应形成支持交叉学科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中，运行类制度为学科运作设立清晰可见的标准；要素类制度对学科发展中的关键事务和要素进行细致的界定和规范；保障类制度为交叉学科提供相应保障，为学科发展和创新保驾护航。此外，对不同于传统学科的关键方面进行制度规范，有利于协调各方关系，保护势力较弱的一方拥有自身话语权，创建良好的研究环境与氛围；有利于释放学科发展活力，使交叉学科走上理性、客观、科学、快速的发展道路。

(三)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的实践要求

学科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须以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学科快速发展为基准。当今我国高校

某些跨学科研究还停留在简单的叠加重组和汇聚融合上,没有跳出学科范围发展超学科的认知。制度的实施需采取相关举措确保知识的融通整合。此外,由于交叉学科长期处于科技突破和创新的拐点,其在众多学科的前进发展中体现出紧迫性。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各高校应遵照“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的要求,将交叉学科纳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视域和范畴,给予其充分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根据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优势条件大力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将财务和资源投入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交叉学科建设中来,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本研究从学科文化、学科建设、学科结构三方面对制度体系提出实践方面的要求,以保障制度顺利实施。

1. 学科文化方面的实践要求。交叉学科应建立良好的学科文化,培育优良的学科生态和学科文化软环境。首先,高校要形成良好的学科文化生态。高校应对各学科的文化特色进行调查,整合交叉学科群的文化与价值观,预估不同学科研究人员聚合时可能引发的潜在冲突,提前做好准备、形成应对策略。同时,高校应建立学科文化干预机制,定期修订整改,调顺学科文化的氛围与兼容性。其次,高校应建立交叉学科教师和学者群体的公共理性。高校内不同学科、不同院系间的争端都反映出学者公共理性的缺失。高校要加速学者群体理性建设,倡导学术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以问题为导向制定共同的目标,形成学科发展的合力;对研究者的学术道德进行考察,及时惩治学术不端或荣誉挂名者,对学术道德良好、专注研究者进行奖赏,形成公正平等的研究氛围,减少研究过程中的人为阻碍。最后,高校要协调不同学科及研究者之间的行为方式。跨学科研究者拥有迥异的研究背景和行为模式,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存在范式或方法上的冲突。在制度的施行过程中,高校不能以硬性标准协调研究者之间的矛盾,应从学科现实出发给予其更多的包容,尊重研究者人格,倾听其合理需求,提升研究者的信任度和归属感,允许研究者群体在学科氛围内进行有益的探索,构建开放融合的学术生态环境。

2. 学科建设方面的实践要求。建设一流的交叉学科,关键在于学科建设水平的切实提升。首先,“双一流”建设经费应向交叉学科方向倾斜。推动交叉学科向一流学科发展有利于资源向交叉学科聚合,推进核心领域创新,体现学科优势和基本特色,引导其作出突破性贡献。同样,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要想具备一流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支持跨学科的研究与人才培养。一流学科的建设需要大量优质资源,这意味着高校无法令每个学科都齐头并进。高校应避免资源分流,将“双一流”建设经费大量倾斜在交叉学科,确保政策扶持和决策优先,创建良好的资源与发展环境,推进制度更加平稳顺畅地实施。其次,不同学科的学术制度应突出差异性。交叉学科的知识拓展和成果产出几乎没有固定规律可循,学科的发展周期也大不相同,我们不应以传统学科的发展特点套用交叉学科,也不应将某一交叉学科的发展规律推而广之至全体。各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发展目标、资源配置、学科特色等不同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妥善制定交叉学科的各项制度,在教师聘任、学术资助、成果评估等方面考虑到学科的差异,寻求资源配置和发展目标的契合。最后,高校要加强交叉学科的合法性建设。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的合法性身份与资源分配、研究成果的划归与评定、学术荣誉的奖赏息息相关,世界一流建设学科的评定也需要交叉学科明确自身定位。一方面,高校应给予交叉学科一定的发展空间,做出相应制度调整。另一方面,学科逐步发展渐成体系后,院系应给予交叉学科外部合

法性支持，在学院归属或学位授予中体现出承认和保护，使其具备学科合法性。另外，高校也应保证交叉学科在学科隶属、成果评价、职称评定等方面拥有合法权益，提升学科合法性。

3. 学科结构方面的实践要求。高校应加强交叉学科的组织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科结构和布局。首先，高校要加强学科组织的建设。交叉学科的研究平台大多依学科而建，在其基础上建立起实验室或研究中心。但我国高校院系划分过细，导致学科割据严重，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不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高校应大力开展学部制改革，将相近学科归类；创建交叉学科集群，将高校资源高度聚集到交叉学科研究中。各类研究组织应以任务为导向召集研究人员进入研究组织，加强研究者和资源流动的灵活性和共享性；研究机构应根据问题变化进行灵活转变，对功能相近、研究范围趋同的研究组织进行聚集融合，减少资源浪费。其次，高校要加速完善和改革交叉学科内的各种作用机制。建立交叉学科的动态运行机制有利于保障学科的稳定，促进制度的平稳实施。一是建立专门的交叉学科管理部门和资源配置机制，如建立交叉学科部或交叉学科管理委员会等，对学科资源分配、成果归属等问题进行规定，对相关研究进行扶持和资助。二是建立交叉学科放管结合的设置机制，给予交叉学科一定的自由空间和学术权力，允许学科自主处理相关事务，同时对其课程计划、学位授予进行试点考察。三是建立交叉学科的质量监控机制，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研究领域对学科发展进行质量监控，设置招生、培养等环节的专项检查，构建交叉学科发展的质量保证体系。四是完善并改革交叉学科的考核和评价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工作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我国高校应加强以学科创新和知识融合度为判断标准的学科评价，以差异化的思维构建学科评价机制，形成交叉学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同时，评价和考核主体应在源学科的成果归属范围内划归交叉学科自身的成果评议区域，进行同行评议。五是建立民主决策机制与执行监控机制，对于各项基本工作的决策应广泛征求学科内部群体的意见，对各项制度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避免出现制度执行的漏洞，保障学科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自《高校教育管理》2023年的1期）
